



装帧设计：诸黎敏

ISBN 978-7-5427-6473-7



9 787542 764737 >

定价：35.00元



琼英留韵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编

宋庆龄生活故事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慶齡

宋庆龄生活故事







琼英留韵

宋庆龄生活故事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编

傅强 撰文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假如一切可以重来，我还会选择这样的生活。

前言 / 2

宋庆龄的婚姻生活 / 4

1. 爱神的降临 / 5
2. 惊世骇俗的婚姻 / 9
3. 共同的岁月 / 15
4. 痛失爱侣 / 19
5. 忠贞不渝 / 23

宋庆龄的经济生活 / 26

1. 嫁给革命 / 27
2. 战争岁月 / 34
3. 收入与支出 / 40
4. 补助“风波” / 43
5. 捐出巨款 / 47
6. 宋庆龄的遗产 / 49


宋庆龄的日常生活 / 52

1. 钟爱旗袍 / 53
2. 追求时尚 / 59
3. 节俭的宋庆龄 / 63
4. 顽疾荨麻疹 / 68
5. 乐观的心态 / 75
6. 热爱烹饪和美食 / 79
7. 宋庆龄的待客之道 / 84

宋庆龄的兴趣爱好 / 90

1. 宋庆龄与音乐 / 91
2. 宋庆龄的电影情缘 / 99
3. 宋庆龄与电影事业 / 107
4. 宋庆龄的书画情缘 / 112
5. 宋庆龄养猫 / 118
6. 宋庆龄养鸽子 / 122
7. 宋庆龄与花 / 129
8. 宋庆龄打康乐球 / 135
9. 宋庆龄与足球的故事 / 138

参考文献 / 146



主 编：金晓春
副主编：徐士芳 邵 莉
编 委：麦灵芝 傅 强 宫洁菁 郑培燕
撰 文：傅 强
配 图：仲灵颖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建馆 30 多年来，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游客。在接待工作中，我们发现，到这里来参观的游客，不仅想了解宋庆龄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脉络，他们对宋庆龄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好奇。

宋庆龄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她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她过得富裕还是贫穷？她平时穿些什么？吃些什么？看些什么？什么样的事情让她烦恼？什么样的事情又会让她高兴？她的晚年孤独吗？那些关于她的流言又是怎么一回事？

每次讲解结束后，讲解员们都要回答很多类似上面的问题。很多时候，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让一个更加真实、更加鲜活的宋庆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宋庆龄是一位伟人，她也有常人的一面，她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看书、听音乐、弹钢琴、看电影、烹饪都是她放松身心、陶冶情操的方式。

宋庆龄还是一个爱美的人，她对着装有着自己的品味，她的服饰从不追求华美，却由内而外透出一种高雅和美感。

身为国家领导人，宋庆龄的薪水不低，但是因为时常资助他人，在国务活动中也不愿增加国家负担，总是“私款公用”，所以弄得自己常常手头很紧。

晚年的宋庆龄是孤独的，而孙中山在她的心中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直到生命的最后，她从没有背弃过对孙中山的诺言：“我一切都不爱，爱的只有你。”

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许不被历史学家所重视，但却是宋庆龄最为真实的一面。这些细节，这些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宋庆龄的喜怒哀乐，也是她的悲欢离合。这是宋庆龄最不为人知的一面，也是她最可敬可爱的一面。

这些，就是宋庆龄的生活故事。

宋庆龄的婚姻生活



慶齡

婚姻生活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这场婚姻改变的不仅仅是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人生道路，也对他们各自的家族、对身边的友人、对后来的中国政坛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后人把这场婚姻称为20世纪中国的“世纪婚姻”。

1. 爱神的降临

1913年，宋庆龄从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随后前往日本与家人会合。抵达日本横浜的第二天，她便随父亲一道拜访孙中山，这是她成年后首次与孙中山会面。不久之后，宋庆龄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在孙中山的身边，宋庆龄不仅负



1916年4月24日，孙中山、宋庆龄在日本合影。



1913年宋庆龄的大学毕业照。

责英文打字、帮助孙中山起草信件和声明，还掌握了进行地下政治活动所需的技巧和保密措施。她学习如何把密信写成密码、如何把密码译成明文、如何用隐形墨水书写。她懂得了准时和确切的重要性，以及把所有多余文件随时销毁的必要。这种谨慎小心的习惯后来伴随了宋庆龄一生，甚至成为了她性格的一部分。

在为孙中山工作的这些日子里，对宋庆龄来说，孙中山不再只是父亲的挚友、中国革命的领袖，而是一位让她深深崇拜的博学多才的英雄和导师。她曾在给

妹妹宋美龄的信中写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慢慢地，宋庆龄对孙中山由崇敬而渐生爱意。对孙中山来说，宋庆龄也不仅仅是老朋友的女儿、自己的英文秘书，她的美丽与温柔使他在人生低谷时，得到了安慰。孙中山的心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宋庆龄占据。

1914年11月，宋庆龄与新婚的宋蔼龄夫妇一起回到上海，孙中山给正在上海学习中文的宋庆龄送去了很多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还对她未来的工作给了很多鼓励。宋庆龄则对孙中山派来的使者朱卓文表示：“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

宋庆龄的这次离去，让孙中山有点手足无措。他不知道这一别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与她再会。一向神采飞扬的他开始无精打采起来，整

天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的微妙变化让细心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的夫人德子察觉了，在她的追问下，孙中山坦言：“我忘记不了宋庆龄的事，遇见她，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体会到了相思的痛苦以及恋爱的那份喜悦。”孙中山的回答让德子夫人感到震惊，她对孙中山说：“宋庆龄小姐的年龄与您的子女年纪差不多，如果您要与宋庆龄结婚的话，那可是要折寿的呀。”对此，孙中山毫不在乎，他坚定地回答：“不要紧，如果我能与宋庆龄小姐结婚，哪怕我结婚后第二天就死去，我也不会觉得后悔。”

1915年3月，宋庆龄再次回到日本，孙中山亲自到车站迎接。此后，他们之间的“会面”更加频繁。那段日子里，宋庆龄和孙中山不仅一起工作，还常常一起到日本的风景区地游览。在给友人的信中，宋庆龄写道：“……樱

花盛开时节，我们曾抓住时机愉快地乘车长行，深入花海。昨天晚上我们沿着堤边走了整整一个小时，两旁花枝低垂，使我们望不到天。”

据廖梦醒回忆，她的父母廖仲恺和何香凝曾告诉她，一次他们



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人德子合影。

陪着孙中山、宋庆龄、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一起去热海游览。大伙攀登一座小山时，宋庆龄年轻腿脚快先到山顶，孙中山紧跟在后，然后是廖仲恺等人，但孙中山突然用手示意他们别跟着。廖仲恺知道孙的意思，就叫别人也不要再往上爬了。后宋庆龄同孙中山相偕下山，两人都面露笑容，人们推测，就是那一次，他们确定了两人的关系。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同年4月9日，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等在日本友人田中昂寓所集会声讨袁世凯（又称“帝政取消一笑会”），图为当时的合影。

2. 惊世骇俗的婚姻

1915年7月20日，孙中山写了一封信给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告诉他宋庆龄想嫁给一个已有妻子的“Arch traitor”（“大叛徒”“大叛国者”“大卖国贼”），宋庆龄与这位“Arch traitor”结婚后，可能会成为“皇后”式的人物，显然，孙中山信中的“Arch traitor”指的就是自己，这封信的目的正是为了试探宋耀如的态度。但是宋耀如却误解了，他认为孙中山所说的“Arch traitor”是袁世凯或袁世凯一类的人物。他在回信中写道：“我极为意外地从您那里听说，罗莎蒙黛（宋庆龄的英文名）应允并且期待结婚……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



1913年，孙中山、宋耀如（左一）等在日本大阪参观每日新闻社。

个天大的玩笑。它听起来如此奇特，如此可笑，这是超出于我的想象之外的小孩儿的玩笑话。”“我能向您保证，我们是如此高度地尊敬您，永远不会做任何事情去伤害您和您的事业。‘大叛逆者’是我们大家永远的敌人，罗莎像您一样极为憎恨这种人，所以，不会有和这种坏人结婚的可能的危险。加上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为任何人作妾，哪怕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王、皇帝或者是总统。……不论是谁，我们不会允许女儿去和一个已有家室的人结婚。对于我们说来，好的名声远比荣誉和面子重要。”

很显然，宋耀如误解了孙中山的来信。不过，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宋耀如对宋庆龄婚姻的态度：“我们不会允许女儿去和一个已有家室的人结婚。”



1916年4月24日，孙中山、宋庆龄合影。

或许正是因为知道了宋耀如的态度，孙中山于1915年9月在日本东京与原配卢慕贞办理了离婚手续。孙中山与卢慕贞的婚姻属于旧式包办婚姻。“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但卢夫人却返回澳门，实际上两人已经分居。孙中山曾在致英国恩师詹姆斯·康德黎爵士的信中，坦陈了自己和夫人卢慕贞离婚的原因：“我原来的妻子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

日子里，她没有在国外陪伴过我。她需要和我的老母亲定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中国旧风俗再娶一个侧室。但我所爱的女子（宋庆龄）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宋庆龄）。这样一来，除了同我的前妻协议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任何办法了。”

根据学者杨天石的分析，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的最大阻力其实还是来自宋庆龄的母亲倪珪贞。这一年的10月，在得到孙中山已和卢慕贞协议离婚的消息后，宋庆龄正式向家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要与孙中山结婚。倪珪贞立即坚决反对，她对宋庆龄说：“你疯了，你简直疯了！他已经有两倍于你的年龄，同时又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我决不同意这件婚事。”而宋耀如虽然也很生气，但是他还是比较冷静的，要宋庆龄“等待一下，让我们再考虑考虑”。宋庆龄写信给孙中山：“我现在只是为着父亲，才留在这里，你是认识他的。同时你也知道他既然叫我等待，那是我不得等等的，但是等可是苦事，是非常的苦事，如果讲到我母亲的见解，那末等待完全是白费功夫。”在给宋美龄的信中，她又写道：“母亲所以不许我去（日本），是因为反对孙先生（和我结婚），而父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他要我详细地考虑，而（且）要我得到相当的把握！……”

宋庆龄知道，要自己的父母改变主意很困难，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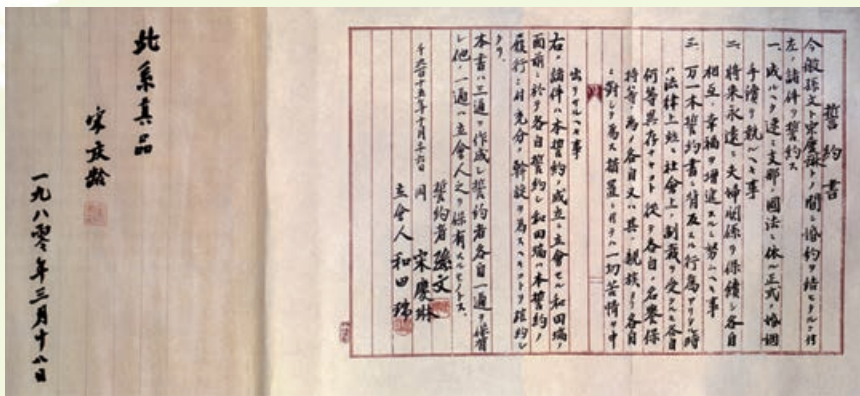


宋庆龄的母亲倪珪贞。

她给父母留下一张告别的字条，悄悄离开了家，与朱卓文父女一起回到了日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曾说，宋庆龄被父母锁在了屋子里，她在女佣的帮助下才从窗户逃了出来。这一说法一直广为流传，事实上，宋庆龄在世时就曾“辟谣”，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的父母也不是那么愚昧、残酷！……他们从没有‘把我锁起来’！我离开家乘轮船，在一个同志和他女儿的陪同下去日本。那时是早晨6点，我父母还没醒。那才是事实！”

1915年10月25日，在廖仲恺、何香凝一家人和少数几个朋友的见证中，孙中山和宋庆龄庄严地签下了结婚誓约书。虽然这是一场没有亲人祝福的婚礼，但是朋友们的祝福依然带来了欢乐，他们按照日本的风俗喝小糯米团赤豆汤，还一起唱起了婚礼歌。

当时宋庆龄的父母还曾赶到日本，想要阻止这场婚姻，但是，为时已晚。宋庆龄曾回忆当时的情景：“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誓约书。

伤心地哭了——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而宋耀如最后只能无奈地对孙中山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

后世有许多人认为，宋庆龄的父母自始至终没有承认他们的婚姻。

事实上，不久之后，宋庆龄的父母还是认可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宋庆龄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寓所中至今还保存着许多父母赠送的嫁妆，包括一套藤木家具、宋庆龄母亲结婚时穿的绣服、百子图的被面等，这些嫁妆包含着他们对爱女婚姻的祝福。

在上海宋庆龄故居，还有一件特殊的文物也见证着宋氏家族对两



宋庆龄的嫁妆之一——藤木家具，现存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人婚姻的认可。这是一张极为少见的玻璃底片，底片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宋庆龄的母亲倪珪贞、宋氏三姐妹、宋子文、廖梦醒、廖承志等人，而分立的人群最左侧和最右侧的，分别是孙中山和孔祥熙——宋家的两个女婿。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发现的唯一一张孙中山和宋氏

家族在一起的合影，这张珍贵的玻璃底片也成为了宋氏家族认可孙中山、宋庆龄婚姻的最为直接的证据。



孙中山、宋庆龄与亲友们的合影。

3. 共同的岁月

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后，曾在日本居住了半年多。婚后的生活简单而幸福，他们时常一起外出，或是购物，或是去上野公园，或是参观各种展览会、画展，而更多的时候，宋庆龄仍然像结婚前一样，一丝不苟地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帮助他处理英文信件。

宋庆龄曾这样描述那段日子：“我的丈夫有很多书，他的起居室里挂满了彩色地图。他有时召集办公室的同志们如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邓仲元等一起讨论工作。他晚上爱做的一件事是把各种大地图铺在地上，然后弯下腰蹲在地上用彩笔勾画河道、运河、港口、江河和铁路等等。我的工作是为他读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书、社会学的书。他虽然已经放弃医生业务，但对于医学书籍仍有兴趣。我从不读小说或故事一类的书，但有时朗读一些轻松的文章，如当时英语和日语报刊上的短文以及詹姆斯·康德黎爵士和他夫人从伦敦寄来的读物。……那些夜晚，可以说是我当孙先生学徒的时代。”

宋庆龄时常幽默地把自己的婚姻比作“上学”，只是“没有了考试的打扰”。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她这样写道：“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时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

1918年6月，孙中山和宋庆龄正式入住上海莫利爱路寓所，这是他们婚后唯一一处真正属于自己的温馨家园。在这所幽静的住宅里，孙中山深居简出，伴随他的是宋庆龄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孙中山由于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活，疾病缠身，早年曾患有颇为严重的胃病，这次眼疾又未愈。为了让孙中山早日康复，宋庆龄悉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她常常亲自挑选易于消化、富有营养的食材，为自



莫利爱路寓所（今上海孙中山故居）。

己的丈夫煲制营养汤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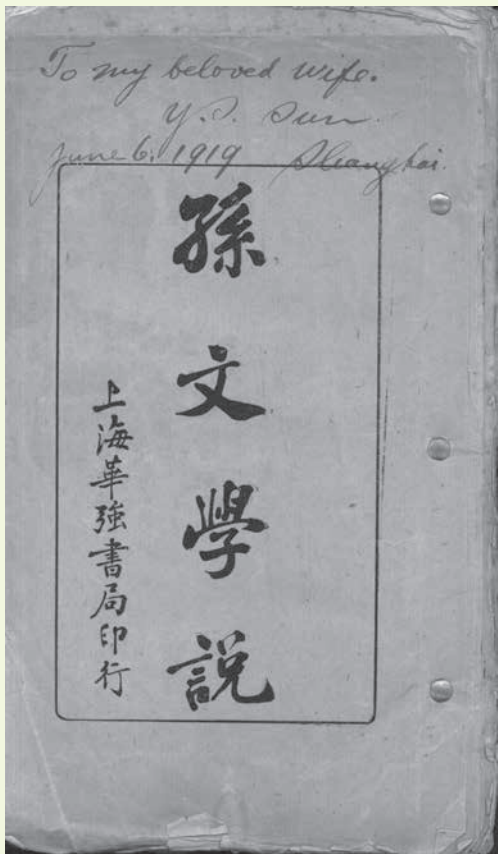
在孙中山写作的间隙，宋庆龄还和他一起进行体育锻炼。每天清晨，宋庆龄陪着孙中山一起在花园里散步。孙中山工作时间久了，宋庆龄就会把他从书桌旁拉起来，和他一起打网球或是门球。宋庆龄总能使孙中山高兴和愉快，他们常常一边打球，一边彼此说笑。有时，孙中山故意随意把球击打出去，宋庆龄就在旁边又笑又喊，说他只想赢球，什么招儿都使出来了，她喊道：“小心这个布尔什维克！”晚上，他们经常一起看书、读报、聊天，还常常在家里放电影。

温馨的家庭生活，让孙中山感到无比幸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目前我正过着新生活，享受我以前所没有的——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以及一个伴侣，一个贤内助。”在宋庆龄的精心照顾下，孙中山精神的压力得以缓解，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

寓居莫利爱路寓所期间，孙中山常常是白天与朱执信、廖仲恺、陈

少白等研讨革命的理论，晚上读书著作，每每工作至深夜才就寝。那时，宋庆龄以极大的热情帮助孙中山著书立说，她大量搜集和整理著书所需要的各种资料，翻译外国资料信息，同时也为孙中山处理了大量往来函电。在孙中山写作的时候，他每撰一章，即由宋庆龄用打字机打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孙中山写成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为了表达对宋庆龄的感谢，孙中山亲笔在书的封面上题字赠给“亲爱的妻子”。后来，《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与在1917年完成的《民权初步》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

宋庆龄对这个温馨的家园充满感情，她曾经说：“我真想象不出住在北京的宫殿里是何样的感觉！我想我会感到无法消受的，还是住在上海我们自己的两层小楼里才是最舒服的。”



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的《孙文学说》。



1920年，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合影。

4. 痛失爱侣

1924年10月,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的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由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权,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已重病在身的孙中山毅然决定北上。

在漫长的旅途中,孙中山的病情不断加剧,抵达北京时,他已是病体不支,无法公开演讲。此后,虽然经过多方治疗,但孙中山的身体却是每况愈下。在那些日子里,宋庆龄衣不解带,日夜看护左右。她始终不愿面对孙中山即将离她而去的现实,直到最后,在众人的劝说下,她才含泪托着丈夫的手腕,在三封遗书上,颤抖着签下名字。

在最后一刻,这一对革命伴侣仍在互诉衷肠。

1925年3月11日下午,孙中山已处于濒危状态,他忽发谵语,命令左右把他放在地上。左右不敢从命,宋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宋庆龄陪同,这是他们在船上的合影。

庆龄闻言赶紧用英语问他：“亲爱的，你要做什么？”

“我想躺到地板上去。”

“地上太凉了，睡不得的。”她轻轻地摇头。

孙中山对着她微笑：“我不怕冷，放在冰上才好呢。”

听到孙中山的谗语，宋庆龄侧面垂泪，悲怆不已。

“亲爱的，别难过，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孙中山看着她一字一句地安慰着。

“我一切都不爱，爱的只有你。”宋庆龄的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断地滚落。

看着泪如雨下的妻子，临危的孙中山难以释怀，他连呼“廖仲恺夫人”，托付她照顾宋庆龄。他还特别嘱咐国民党的领袖们，在他死后，切勿为难宋庆龄。

3月12日晨，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年，他59岁，宋庆龄32岁，两人的婚姻还不满10年。



宋庆龄在孙中山的病榻前。

琼英留韵

孙中山去世后，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丈夫的遗愿，宋庆龄擦干眼泪，重新站了起来。她在丈夫的事业中，寻找丈夫的影子，追寻着他的灵魂深处的脉动。1926年1月，宋庆龄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正式步入政坛。在艰辛坎坷的革命征途中，她渐渐抛弃了天性中的羞涩，成长为一个独立、勇敢的女战士。



宋庆龄在香山碧云寺为孙中山守灵。



宋庆龄 1933 年在上海留影。

5. 忠贞不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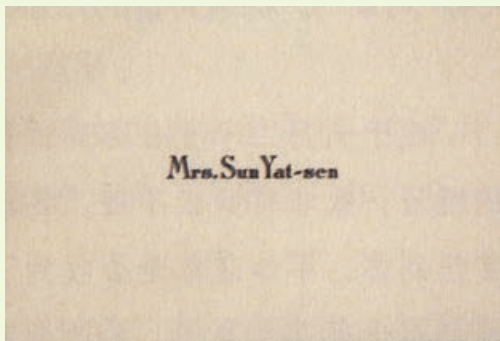
在宋庆龄漫长的一生中，她几乎一直在与敌人的中伤和诽谤作斗争。宋庆龄越是投身于革命事业，越是珍视她的名节，她的敌人们就越是针对宋庆龄的私生活进行造谣。一会儿说蒋介石向她求婚，一会儿又说她在莫斯科与陈友仁结婚，这些谣言深深伤害了宋庆龄，但同时，也让宋庆龄意志更加坚定，她知道，反击这些无耻敌人的最好方式就是继续坚持自己的道路，直到迎来革命的胜利。

其实，早在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之后，关于他们婚姻的流言就始终伴随着两人。有人把两人结婚的时间说成是1914年，认为他们的结合是在孙中山和卢慕贞离婚之前，甚至煞有介事地说宋庆龄与卢慕贞之间爆发了多次争吵，他们还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口吻评价，说历史将会宽恕他们。这些流言给宋庆龄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她不得不一次次在给友人的信中去纠正这些流言。

“文革”时期，造谣之风盛行，别有用心的又开始污蔑宋庆龄，有些人旧事重提，质疑她与孙中山的婚姻，还有人甚至造谣说宋庆龄之所以深居简出，是因为她与秘书秘密结婚。面对这些谣言，已过古稀



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孙中山像前留影。



宋庆龄的英文名片(孙中山夫人)。

之年的宋庆龄写道：“我想，对那些无端污蔑，我只有闭上眼睛——外面那种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已经够叫人心烦意乱了。”而对那些恶意诽谤的人，宋庆龄说：“世间自有公正的头脑，所以让这些狗去叫吧！”

宋庆龄曾说过，自从认识孙博士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直忠实于他，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依然忠实于他。无论在什么场合，她始终把“孙中山夫人”作为自己的最重要的身份，将孙姓作为自己的正式姓氏，并以此制作名片，以此通信。在宋庆龄的寓所，处处可见孙中山的照片、遗物。平时，她总是随身携带着一只圆形的银质小镜框，厚实的玻璃下，镶嵌着孙中山生前拍摄的一张二寸的小照片。无论是到北京、到上海，甚至出国访问，她第一件事就是把镜框用布擦拭干净，然后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的床头柜或一眼就能看见的橱柜上。

宋庆龄后来很少参加孙中山的纪念活动，有人据此造谣污蔑，说是因为宋庆龄背叛了孙中山。事实上，宋庆龄自己说过，同孙中山的婚姻是在她心中“留下最深切感受”的事情，但是，回忆对宋庆龄而言意味着再次经受失去爱人的痛苦。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关于我和孙博士的关系，那是我至死也不会忘却的，我们日复一日地一起工作，亲密无间。回忆这些事，就意味着要重新经历这些事，它深深地影响了我。”“每当我试图去回忆我和孙博士在一起的日子，我的伤口就被撕开。为这个原因，我不打算参与任何类似的纪念会议。每当人家纪念这样的日子，我却是在经历痛苦。”“告诉那些询问关于我与孙博士共同生活情况的人，我不能接受他们的要求。”

宋庆龄还曾致函与她一样早年丧偶的廖梦醒：“你懂得，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相互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更深沉。只要我活着，我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和悲伤将永远不会消失。……但正像你说，我们终有甜蜜和爱恋的记忆留在心间。”



1923年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合影。

宋庆龄的经济生活



慶齡

经济生活

宋庆龄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的家族在民国时期与蒋家、孔家、陈家并称为“四大家族”。但是宋庆龄的一生却过得并不富裕，与她的姐妹不同，宋庆龄常常会为金钱而烦恼。与孙中山共同度过的十年里，他们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成为宋氏家族中最贫穷的一个。

1. 嫁给革命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早年在海外谋生，回国后一面传教一面经营实业，积累了丰厚的财富。年少的宋庆龄根本不用为金钱而烦恼，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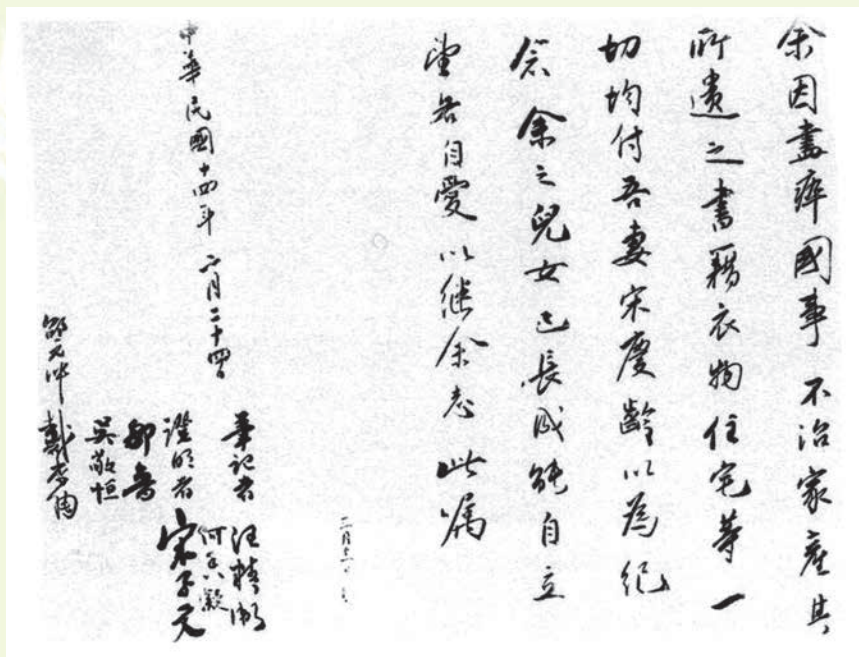


宋庆龄 1929 年 6 月与家人合影。

那时的富家子弟一样，她热衷于一切美好的事物：舞会、电影、美景、华服……对于上流社会的生活宋庆龄并不排斥，她还曾表示自已已开始习惯于“生活高贵，思想简单”。

不过宋庆龄并没有在奢华和享受中沉湎太久，她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时候，正值袁世凯阴谋篡权，残酷的现实深深触动了宋庆龄，她后来曾这样写道：“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之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从此之后，宋庆龄就走上了一条无比艰辛的革命道路，而这种艰辛不仅来自革命事业的困难重重，也体现在她的生活中。

孙中山一生廉洁奉公，对公款分文不沾，更不讲求享受。他没有



孙中山家事遗嘱。

自备车辆，有事外出都要临时雇佣马车，有时雇不到车，就步行前往。平日用膳，菜不过三四味，每天菜金不超过两元。孙中山一生的财物，他曾在《家事遗嘱》中列举：“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简单的衣物、几千本书、一所住宅、一些还未用完的日用品，这，就是孙中山留给宋庆龄的所有遗产。

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人物。蒋介石为了拉拢她，许以高官厚禄，都被宋庆龄严词拒绝。在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之间，宋庆龄和孙中山一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牺牲个人利益，他们都痛恨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民族、国家利益的行为。一次，宋庆龄听说汪精卫的太太陈璧君坐公车到汉口最大的英商惠罗公司为她女儿购买豪华服饰，之后却把发票交给公家付账时，宋庆龄极度愤怒，她痛斥道：“她算什么革命党？这些人还有丝毫人格吗？”

1927年7月，为了完成孙中山的遗愿，也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宋庆龄决定远赴苏联。但是，与南京蒋介石政府的对立和家人的决裂让宋庆龄失去收入的来源。为了劝说宋庆龄打消访苏的念头，宋家人告诉她，只要不去苏联，到西方任何国家，家里都会全力支持，承担一切费用，宋子文还拿出一本可以任意支取的空白支票本。但是，宋庆龄最终还是违背家人的意愿来到苏联，这样，也就断绝了从家人那里获得经济支援的可能。虽然宋庆龄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头衔，但她不愿意去领取他们的薪金，她的主要收入来源，只剩下孙中山去世后抚恤金的微薄利息而已。而这点钱，甚至不够宋庆龄到苏联的旅费。

好在因为身份特殊，她的访苏计划苏联高层非常重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同意拨给宋庆龄和叶甫[根尼]·陈（即陈友仁）1万卢布用作赴苏联的旅费”、“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拨出4000美元作派遣费用”，同时，陈友仁、宋庆龄、邓演达在苏联逗留期间的



宋庆龄抵达莫斯科，受到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

全部接待工作都将由苏方负责。

1928年春，宋庆龄在克里姆林宫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认识和消极态度让宋庆龄非常失望，她决定离开苏联。但是，此时的宋庆龄几乎已是身无分文，后来几经周折，才凑够了前往德国的旅费。

宋庆龄在德国的生活更加拮据，她租住在一栋普通公寓楼的单元房里，吃的是最便宜的食物。有书中写道，在那段时间宋子文给了宋庆龄一笔钱作为生活费，事实上，宋庆龄晚年时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这件事：“……认为宋子文设法给了我一小笔钱为生活之用。事实是孙博士死后，国民党知道他没留下分文，送了100000元（广东币）给我做生活之用，后来还给了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同样多一笔钱。子文从来没有提出要给我钱，因为他知道我不会收他的或是我家任何一



宋庆龄在德国柏林留影。

个成员的钱。我弟弟尊重我，尊重我的意愿。我在欧洲的时候，孙科给我一张支票，因为他说我来自国民党资金的收入不够我在国外生活的，我立刻把支票还给了他，说：‘我过着跟那里所有的学生一样的生活（我在柏林图书馆读书）。住的是从房东那里租的有家具的房间，每天只花50芬尼（50分）在一家中餐馆吃一餐，所有的食物也就是面包、茶和果酱，跟其他在那里的学生一样。’”

虽然生活窘迫，但是宋庆龄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愿接受任何“来历不明”的资助。一次，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从美国到柏林访问宋庆龄。他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之委托，邀请宋庆龄到美国访问，在电台上对公众发表几次讲话并在公众场合露面，该公司答应付给5万美元的酬金。希恩希望宋庆龄接受，认为她可以借此机会把中国的现状告诉美国人民，并可以用这笔酬金作为进行政治活动的经费。

令他没想到的是，宋庆龄竟然拒绝了这个要求。宋庆龄向秘书章克解释说，如果自己去了，就很有可能落入一个有利于蒋介石和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策的陷阱。宋庆龄的谈话或沉默都有可能被误读为接受蒋政权的合法性，而后来事实也证明了宋庆龄判断的正确。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为了拉拢宋庆龄，蒋介石殷勤有加，在沿途每站都安排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还安排了宋子良、宋美龄对宋庆龄进行劝说，面对家人的劝说，宋庆龄回答道：“是宋家为中国而存，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8月10日，戴季陶奉蒋介石之命，偕夫人到上海再次游说宋庆龄赴南京。戴季陶告诉宋庆龄，在南京为她修建了一流的宅院，而且那里有宋庆龄的亲人，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会比较快活些。宋庆龄义正词严地回答：“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她还痛斥了国民党的腐化堕落：“我只要求你们停止提高你们的物质生活。这已经是太奢华了，超过普通一般人万倍以上了。我知道有许多军阀官僚几年

前都是很贫穷的，现在忽然坐上高级汽车炫赫夸耀起来，在租界上为新娶的姨太太购买大厦。我请问你，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想，假如孙先生还健在，他能容忍这种现状吗？假如，你也还是有良心的，你不能不承认现在的国民党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的意义吧。”



1929年5月28日，宋庆龄、宋子安、宋美龄、蒋介石、宋子文等由南京浦口车站向江边行进，迎接孙中山灵柩。

2. 战争岁月

1931年，宋庆龄从欧洲回国，居住在莫利爱路寓所，直到上海沦陷后，她来到香港，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向全世界募集资金和救济物资援助抗战。“保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人们都愿意把捐款交给宋庆龄，不仅是因为他们尊敬和爱戴这位孙中山的助手和遗孀，还因为人们知道，和孙中山一样，宋庆龄在财务问题上的绝对正直。不论政治倾向如何，他们都相信，他们为支援战火中的中国而捐献的款项，只要是交付给孙夫人的，那就绝不会有一分钱被侵吞或浪费。一位外国友人写道：“在她那鹰一般尖锐的目光下，没有发生过钱被无耻官员吞没的事情。”



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法朗士、廖承志。

“保盟”向所有捐赠者承诺，所有的援助一定按真正的需要进行分配，如果捐赠者指定是给谁的，也一定严格地按捐赠者的意愿办理。宋庆龄对资金方面的事情特别认真。每一笔给“保盟”的捐赠，不论数额大小，收据上都有她的亲笔签字。后来，宋庆龄还专门定做了一枚刻有自己英文姓名缩写“SCL”的印章，用来在捐赠者的收据上盖章。据说，还有人就是因为崇敬宋庆龄，为了得到她的亲笔签名而捐款。

宋庆龄说过，要“把每一枚铜元用到祖国的抗日战争中去”，虽然每天经手大量的款项，但她自己的生活丝毫没有改善。在香港，她没有汽车，也没有侍卫，每天步行到“保盟”办公地点。通讯员潘标经常往来于宋庆龄的办公地点和家中，他看到，宋庆龄连个风扇也没有，唯一的电器是个冰柜，不过也是“超期服役”，运转起来轰轰作响。潘标经常会因送信而耽误了中饭，宋庆龄就给他两角银元，让他在路上买点吃的。一次，潘标问给宋庆龄煮饭的师傅：“孙夫人菜金有多少？”师傅回答说：“每天两角银元的菜金。夫人最爱吃的是饭焦，也就是锅底的糊米饭，很省钱的。”潘标这才意识到，原来宋庆龄给他的午餐钱等于自己一天的菜金，他感慨道：“我到保卫中国同盟工作，见过的达官贵人、夫人小姐不少了，可哪曾有一位像孙夫人——我们的国母这样生活的呢？”

1939年冬天，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陪同叶挺从重庆飞到香港，拜访宋庆龄。宋庆龄见到叶挺非常高兴，为了待客，特意从她弟弟宋子安家里借来一位厨师做了一桌菜，款待新四军的使者。叶挺和沈其震并不知道，其实，此时的宋庆龄正面临着“经济危机”，她在给



刻有宋庆龄英文名字缩写 SCL 的金戒指印章。



宋庆龄在香港留影。

友人的信中写道：“货币的比价大跌，这对我们这些必须在这儿住下去的人是个大问题。现在要4元钱才能换1元港币，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境况多惨……”

在香港沦陷前夕，宋庆龄预料到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问题，她甚至做好了吃咸菜度日的打算。一天，宋庆龄指着厨房里的一罐咸萝卜对潘标说：“以后要吃这东西了。”她还亲自用筷子夹了一条给潘标，问他：“好吃吗？”潘标回答：“好

吃的。”虽然其实觉得难以下咽，但是，连宋庆龄都做好了最艰苦的准备，潘标又怎能挑三拣四呢？

香港沦陷后，宋庆龄来到重庆，她重建了“保盟”，继续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民募集捐款和医疗物资。与“保盟”工作的风生水起相比，宋庆龄在重庆时期的物质生活依然毫无起色，她穿着当地出产的苧麻布做的衣服，有时，她甚至置备不起必要的穿着去参加那些重要的宴会。美国作家格雷厄姆·佩克记下了他所看到的情况：尽管她有一所房子住，她的兄弟们又借给她一辆车，她作为孙逸仙博士遗孀

所领的抚恤金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她想在屋里置一个座钟，但自己没有钱买，又不愿去求她的亲戚。宋庆龄时常会在长江南岸乡间小路上长时间散步，有时路人会认出她来，人们目瞪口呆地站着不动，不由得喊出：“孙夫人！”

在国家危亡的关头，国民党的高官们却仍然保持高消费的习惯，对此，宋庆龄直率地进行批评。那时，重庆的夏天闷热不堪，而少数特权阶层却享受着奢侈的人工降温。有一次，制冰厂出了故障，

宋庆龄用尖锐的笔触讽刺他们：“上星期……因为本地的制冰厂出了故障，城里几乎发生一场革命行动。外交官们也凉快不了、文雅不了啦。……冰厂门前每天都摆起了长龙。在街上发生抢冰的打斗，所以现在人们都用汽车装……常常还有挥舞手枪的卫兵保护着。因此，冰也出现了黑市……50磅1200元，老天爷！”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她发现，孙中山留给自己的唯一遗产——莫利爱路寓所也在战争期间遭遇了劫难。在八年时间里，房子遭到了日本人的劫掠和破坏，不仅孙中山的许多珍贵遗物被劫走，



宋庆龄在重庆留影。



靖江路 45 号寓所。

连房子也几乎无法居住了。后来，宋庆龄将莫利爱路寓所捐给了国家，作为孙中山永久纪念地，而她自己搬到了位于靖江路 45 号的寓所，此处寓所体量较小，层高也较低，每到梅雨季节，屋内潮湿闷热，让患有荨麻疹的宋庆龄很不舒服。让“国母”住在这样狭小的寓所里，社会舆论都为宋庆龄打抱不平，连蒋介石自己到这里拜访宋庆龄后，也觉得让宋庆龄住在这样的寓所不合适。尽管如此，宋庆龄最后搬离此处寓所时，已是 1949 年的春天了。

那时宋庆龄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家人留给她的房产的租金，这笔钱原本就不多，而严重的通货膨胀更是让宋庆龄的收入缩水不少，甚至日常生活都难以保障。1948 年 7 月，她写信给友人：“今天黑市上 1 美元换 750 万元法币……价钱天天在涨，像我们这样手上没有黄金的



淮海中路 1843 号寓所（上海宋庆龄故居）。

人，生活非常艰难。一只鸡要 300 万元，所以我们餐桌上是见不着的……绝大多数人的主要食品豆腐本来是便宜东西，现在也要 8 万元 1 磅……米 1 担（110 磅）3000 万元，像我这样的家庭只够吃 1 个月。我们想不吃糖了……”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迎了解放，就在上海解放后的第四天，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等人专程到宋庆龄的寓所拜访。在拜访过程中，他们发现宋庆龄经济困难，当即决定，对宋庆龄进行补助。不久后，上海市委收到中央指示：从优供给宋庆龄的日常费用及实物。

3. 收入与支出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她的工资是579元5角，是当时最高的一级工资。

尽管宋庆龄的工资很高，但是她的手头仍不宽裕，有时还会出现赤字，偶尔周转不过来的时候，她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借过钱。她的秘书张钰说：“记得有一次，我的工资从上海汇到北京后，还替夫人垫付过她的家用。当然，那只是暂时的。”

这是因为宋庆龄虽然收入很高，但是她每月的开销更大。宋庆龄的工资除了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费用外，她还长年承担着两个保姆的工资，宋庆龄告诉秘书李云：“原来李妈（李燕娥）工钱25元，现在钟兴宝的工钱要45元，当然李妈也要和她一样。”李云说：“这两人的工资可以由公家负责。”她说：“不行，我不愿增加国家的负担。”包括宋庆龄身边工作人员的伙食费，原本也已列入政府财政开支的，“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取消了这笔费用。于是，工作人员的伙食费就由宋庆龄自己出钱承担了。工作人员都表示，自己每个月都有工资，伙食费理应自己支付。但宋庆龄坚决不肯，她觉得有责任照顾好大家。

每当身边工作人员有困难，宋庆龄也常常掏钱帮助他们。警卫秘书隋学芳因病瘫痪在床，宋庆龄就承担了他的两个女儿的抚养费。得知工作人员小杨家里遭洪水，房屋倒塌，宋庆龄立即请警卫秘书杜述周将修理房屋的钱寄给回家探望父母的小杨。她还细心地写了张便条：“杜同志：请你代汇150元给小杨去作修屋用的。另2元是作汇费的。谢谢你！”北京寓所的采购员张友结婚，没钱操办婚事，宋庆龄就出钱在自己家里给办了两桌酒。



宋庆龄与李燕娥（左）合影。

对那些革命年代的友人，宋庆龄更是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有时，宋庆龄因收入有限，不能给他们更多的帮助，这会让她非常难过。有吉幸治是宋庆龄的好友，20世纪40年代初，他跟随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到中国来支援抗战。1977年，宋庆龄听说有吉幸治去世，她非常悲伤，在给友人的信中，宋庆龄难过地写道：“他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据我所知，对他的可怜的遗孀我们什么也没做。我希望我有钱寄给她。但是，唉！靠工资生活，我只能做到自己收支平衡而已。对此我感到很难过。有吉幸治是多么忠诚和乐于助人。”宋庆龄还曾写信给廖梦醒，告诉她自己很内疚，因为很多亲戚过得很不好：“他们仍挤住在亭子间里，劳动所得只能勉强糊口。我自然要帮帮他们，但那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因为我现在只有自己的薪水收入。”



宋庆龄在上海寓所留影。

4. 补助“风波”

其实宋庆龄除了工资之外，原本每个月还有一笔 300 元的外事费用，“文革”开始后，宋庆龄觉得自己的工资已经很高，再领取额外补贴不合适，便将 300 元补贴退回。不过组织上仍逐月为其存在银行里，并多次将积蓄的存折送还给宋庆龄，但宋庆龄坚决不收。1971 年 5 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送来的几年来积余的每月 300 元活动费共 1.7 万余元，宋庆龄命警卫秘书杜述周全数退回，并说：“为此，昨晚没睡觉，又发了荨麻疹，钱已讲不要了，说什么算什么，不要再送来了。现不交际了，有国际客人用费给报销，自己客人自报。”

1973 年 7 月，工作人员觉得宋庆龄实在经济拮据，就提出是否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积余的每月 300 元活动费取出使用，宋庆龄坚



1952 年，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会见缅甸文化代表团。

持不肯，回答说：“那每月300元我已告他们，讲过交政府。”不过，此事最终还是惊动了周恩来，他专门作出批示：“每月300元活动经费8月起月月照发不存。已存款可取用。”宋庆龄看到警卫秘书传达的周恩来的批示后，说：“您的传达我已看过了。请答复（他们）我现在够用了。……现在如须请客，我即让管理局付了……”

1975年，宋庆龄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中央决定给宋庆龄3万元作为生活补助，警卫秘书杜述周致函宋庆龄，请示是让管理局的同志把钱送来，还是自己去取。没想到，宋庆龄回函再次拒收：“请代向中央负责同志谢谢他们好意，但我决不接受的。我的工资599元已超过别人的工资多倍了……”“这次有几个人，须要帮助付医院等账，因此，超过了我的预算。否则是完全够用的。”她还专门叮嘱杜述周：“请不要代收补助费了。”

尽管为了不给国家增加负担，宋庆龄一再拒收生活补助，但是经济拮据的事实依然存在，无奈之下，实在无法周转时，宋庆龄只好出卖旧货来筹钱。宋庆龄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家中的物品能够保留下来其实并不容易，很多东西对她来说都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实在钱不够用了，宋庆龄只好从家里的旧物中挑出一些，打算卖钱。1979年1月，宋庆龄回到上海寓所，把家里的东西进行整理，挑出一批船模型、电唱机、显像管、翡翠摆件、皮衣服等等，委托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李家炽帮自己卖掉。

关于这件事情，宋庆龄在给友人邓广殷的信中还专门做了“坦白”：“现在，我必须跟你坦白我在这个节骨眼上回上海的原因。我的薪水不足以支付家庭开销，我得给永清和永洁（警卫秘书隋学芳之女）提供吃的、穿的，她们的父亲瘫痪躺在医院15年多了，……我还是入不敷出。所以我必须得回家来，卖掉一些我母亲留给我的皮草大衣，甚至包括从我父亲那继承过来的一些酒。……卖掉上面说到的这些东西，我想我应该可以偿还一些相关的债务了。我不想乞求别人的帮助，我



1979年1月，宋庆龄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寓所的留影。右起：王一平、彭冲、沈粹缜、李家炽、宋庆龄、张甦平。

要自己解决问题。”可是让宋庆龄没想到的是，这些旧物最终也没卖多少钱，她失望地说：“我还以为这些东西能卖到这个价钱的10倍，没想到是这点钱呀！”

后来，宋庆龄的经济状况还是引起了中央的重视，警卫秘书杜述周得知宋庆龄在上海卖旧货的情况后，立即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反映了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组织上决定给宋庆龄生活补助费1万元。这一次，宋庆龄无奈地收下了这笔钱，她告诉杜述周：“1万元我收了，因我的确需用钱。卖掉的机器、皮货等不过收到我所希望的

百分之一！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不过，宋庆龄的这1万元最终并没有动用，宋庆龄逝世后，李家焯在北京她家中整理物品的时候，看到了这笔原封未动的1万元现金。后来，这1万元钱就留存在北京宋庆龄故居。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在了解到宋庆龄经济拮据的情况后，及时向中共中央进行了反映。1979年2月，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给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来信，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5万元人民币给宋庆龄。

不过，宋庆龄并没有把这笔钱作为自己的钱，每次支取，都会说明只是暂借。1979年，宋庆龄的保姆李燕娥患病住院4个多月，因为她吃不惯北方饭，宋庆龄每日必须为她单独准备一份饭菜和营养品，这就造成宋庆龄生活费再次增加。无奈之下，宋庆龄只好写信给沈粹缜，请她从那5万元中暂借5000元，她还特意说明：“我借了钱会及时归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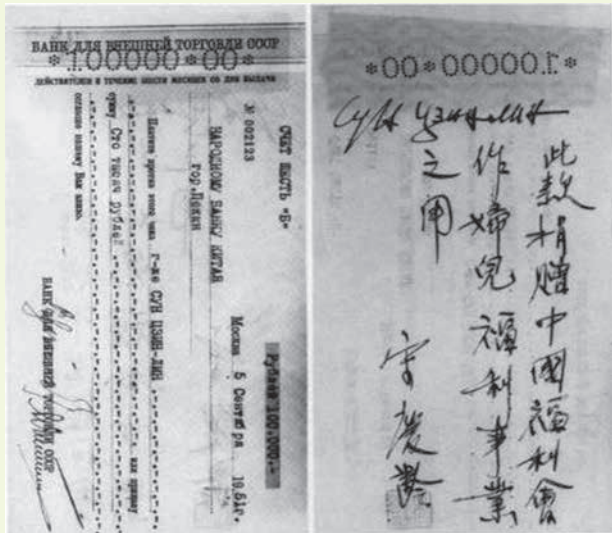
一直到宋庆龄去世，这笔钱也没有用完，大约总共才花了1万多元。宋庆龄逝世后，这笔余下的钱转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保管。

5. 捐出巨款

宋庆龄曾有过几笔“巨款”，但是这些钱却全都被她捐献给了妇女和儿童的慈善事业。

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在收到奖金10万卢布（当时卢布的含金量是0.222168克，同时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等于4卢布。）后，她在支票的背面亲笔写上“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决定用此款在原妇幼保健站的基础上，筹建一所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院以“国际和平”冠名，正是为了继承与发扬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在革命战争年代援建的国际和平医院的优良传统。1952年9月18日，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在长寿路170号正式成立。

1952年9月，宋庆龄收到文集《为新中国奋斗》的稿费人民币5亿元（旧币），宋庆龄将其全部捐赠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年6月，宋庆龄收到《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的第二笔稿费，她写信给罗叔章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奖金汇款单和宋庆龄在汇款单背面的亲笔批示。



宋庆龄在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看望产妇。

（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嘱咐她：“关于稿费的用途，请交给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康克清同志保管支用，并请你代为转交。”此时的宋庆龄尊

麻疹复发，正在接受治疗，考虑到宋庆龄疗养也需用钱，邓颖超将这笔钱退回给宋庆龄，并告诉她，我们“谨将该款转献给您，作为您在病中疗养时不时之需。我们热切地至诚地恳求您勿却，赐予察收。并向您致以亲切的慰问，祝福您早日康复”。然而宋庆龄立刻又将钱寄回，并接连写了两封信给罗叔章，告诉她：“关于这笔款项之用途，我建议送给朝鲜儿童使用。请你转达我的意见给邓、康两位大姐。”可能是担心第一封信表达得不够清楚，三天后，宋庆龄又写了第二封信，明确说明：“关于人民出版社最近两个月付我的两笔稿费：第一笔请交给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使用；第二笔请交给朝鲜儿童使用。请你代我传达这个意思。”后来，这笔稿费（5280万元人民币）被捐赠给遭受战争灾害的朝鲜孤儿，朝鲜战争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长朴正爱来函向宋庆龄表示感谢：“你的诚挚的爱和援助，鼓舞了在战争中站立起来的朝鲜母亲，并增加了她们在进行恢复战后人民经济中争取新的胜利的信心。”

6. 宋庆龄的遗产

宋庆龄一生没有为自己谋取过任何利益，她去世后留下的遗产也少得可怜。据李家炽的回忆，宋庆龄去世后，一共留下了5份遗嘱，遗嘱都很简短，在这些遗嘱中，宋庆龄将自己有限的遗产进行了分配，大致提到的有国画送给×××，衣服送给×××，银器、瓷餐具送给×××等等，其中宋庆龄还特别提到，母亲送给她的黄金饰品是纪念品，不能分。多年来仅有的一点积蓄，宋庆龄则将其全部赠给了北京、上海两地的工作人员。

在她的遗产中，宋庆龄自己最为看重的是她的数千册藏书。早在1974年，她就为自己的这些藏书找好了新主人——挚友邓广殷（邓文钊之子）。1974年8月，她写信给邓广殷，告诉他：“不管怎样，我



邓广殷与宋庆龄在一起。

已经准备好了我的‘遗嘱’，你将获赠我的藏书，因为有一些绝版名著我想你比其他东西都珍惜，而且你跟我一样喜欢读书，对书的珍惜超过其他东西。”这年的12月，宋庆龄再次致信邓广殷，告诉他，孙中山故居的藏书是属于政府所有，但是自己在北京和上海寓所的藏书却是自己收集保存的，这些书报刊、当代和古典名著，可以“打包装到木箱子里船运给你”，“没有人可以阻止这件事”。

1975年2月18日，宋庆龄接到通知，月底北京可能会有一次6级左右的地震，虽然心里很紧张，但是考虑到如果离开北京的话，会在“这里的人民中间引起更大的恐慌”，宋庆龄决定留在北京，“不管会发生什么”。同时，她正式写下了一份遗嘱，表达了要将藏书赠给邓广殷的意愿。

遗嘱

1975年2月18日

如果我有不测发生，我意愿将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号家中的所有书籍赠予邓广殷同志，以答谢他对我的善意。

宋庆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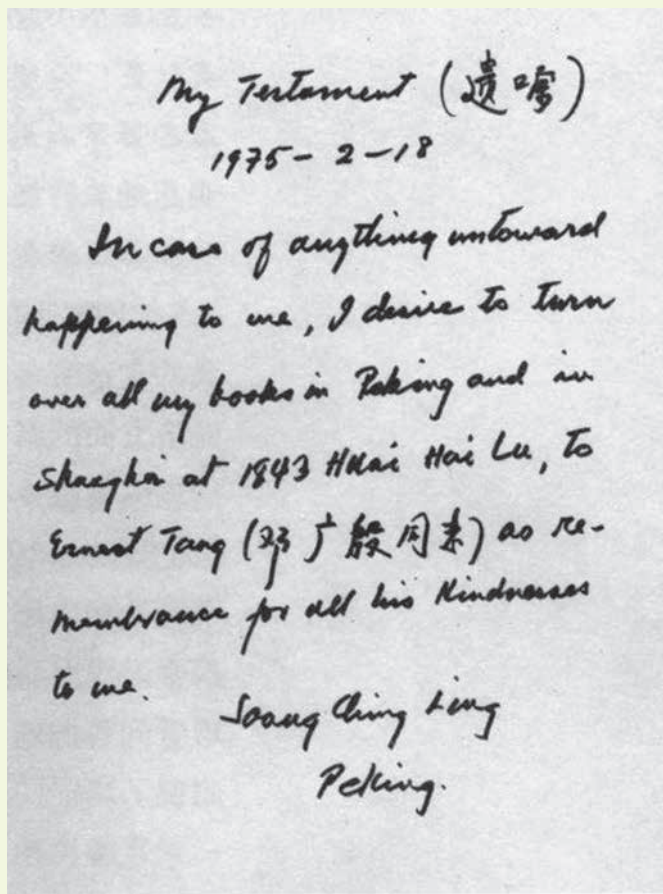
北京

宋庆龄去世后，邓广殷根据廖承志的建议，无偿将这些书全部捐给了国家，仍然保存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故居中。邓广殷觉得，宋庆龄将藏书全部赠给自己，不仅体现了宋庆龄对他的情谊，也源于宋庆龄的一贯为人：从不忘记别人给过她的帮助，真诚地向每一位帮助过她、为她做过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而他将这些捐给国家，就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些藏书能够得到最好的保护和利用，让宋庆龄的“遗产”真正地发挥其价值。

回顾宋庆龄的一生，她对金钱的态度是不言自明的。在她看来，人的一生应该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为了这种理想，她可以放弃优越

的家庭条件，和孙中山一起走上艰险的革命道路；为了这种理想，她可以放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独自一人去承受所有的艰辛和困苦；为了这种理想，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她宁可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也不愿给国家和人民增加负担。

宋庆龄的一生，正如她自己所说：“一个人的精神、智识、时间和金钱，都是应该拣择那最高尚、最宝贵的事用去的。”



宋庆龄的遗嘱。

宋庆龄的日常生活



慶齡

日常生活

晚年的宋庆龄总是以端庄的政治家形象示人：投身中国建设、沟通海内外、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始终保持着微笑、淡定、沉稳而优雅的姿态，关于她的日常生活，人们很少了解。其实，生活中宋庆龄和常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她喜爱服饰，但从来拒绝奢侈；她钟爱美食，但也曾食不兼味；她饱受病痛的折磨，但却始终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从没有屈服于病魔。

1. 钟爱旗袍

许多年后，当宋庆龄的友人们回忆起初见宋庆龄的印象时，总不忘谈到她那身朴素却极具美感的旗袍。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这样写道：“她身穿色调柔和剪裁合身的旗袍，打扮得很是整洁，乌黑发亮的头发往后梳，在脑后挽成一个髻，秀美的脸庞宛如浮雕像，除了一只玉发夹外，她极少戴别的首饰。”

另一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道：“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我在世界任何地方认识的最温柔最高雅的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宋庆龄在上海留影。



1925年宋庆龄摄于上海。

她身材纤细，穿着洁净的旗袍，善良而且端庄。”

苏联友人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回忆说：

“宋庆龄穿着中国旧式的端庄的黑色旗袍，高领，右边扣襟，短袖，袷上镶有花边。头发平滑地向后梳，在后脑紧紧地挽成一个髻。”

德国友人王安娜则写道：“她的服装也像周围的陈设一样简朴，她虽然穿的是素色的中国服装，也没有刻意打扮，但正是这种质朴使她显得更美。”



宋庆龄 1942 年在重庆留影。

一袭素雅的旗袍，传统的中国式的发髻，这是宋庆龄留给大多数外国友人的第一印象。翻阅宋庆龄的影集，我们会发现，从 1925 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宋庆龄身上的旗袍一直紧跟着（甚至引领着）时尚，从 20 世纪 20 年代平直宽大的传统旗袍到 30 年代的“改良旗袍”，从最初的 20 世纪“倒大袖”到后来最为流行的“扫地旗袍”，我们都可以在宋庆龄的拍摄于各个年代的照片中一一找到对应。不过，宋庆龄的旗袍也保留了自己的特点，虽然在剪裁样式上总体与当时流行的款式相一致，但是宋庆龄总会选择相对素雅的款式，且偏爱深暗的色调。30 年代，社会上流行的旗袍款式开衩越来越高，但宋庆龄却始终穿着低开衩的款式，

最高也不过膝盖。至于后来出现的无领、无袖款式的旗袍，宋庆龄更没有盲目跟风，她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原则，这既是因为她特殊的身份，也和她个人的审美情趣有关。一生钟爱旗袍的宋庆龄，始终保持着一一种端庄优雅的风格，旗袍穿在她的身上，更多地显出一种内敛而不张扬、优雅而不轻佻、贤淑而不争艳的气质，而这种风格也正与国人的审美心理及中国女性的体形特质完美契合。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保存了不少宋庆龄当年穿过的旗袍，这些旗袍款式、材质各不相同，但选料和做工都极为精良，其中一款厚呢质长袖旗袍是宋庆龄在秋冬季节穿着的，而夏季的短袖旗袍则有亚麻、丝绸、薄呢等多种材质，不过，宋庆龄最为偏爱的还是香云纱质地的旗袍。香云纱俗称莨绸、云纱，其优点在于质地轻薄，夏日穿着爽滑不粘皮肤，据说还对皮肤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宋庆龄一直为严重的皮肤病所困扰，偏爱香云纱这种材质可能也与宋庆龄的皮肤病有一定关系。

在宋庆龄看来，旗袍不仅是一种流行的女装，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的服饰。她曾将一件旗袍作为礼物送给帮助中国募捐的外国友人，并告诉她：“在为中国人募捐的时候，希望你穿着中国的衣服。”后来，按照宋庆龄的嘱咐，这位外国友人每次从事募捐活动时都



宋庆龄身着香云纱旗袍留影。

穿着旗袍。

新中国成立之后，旗袍被视为旧时代的产物，越来越不被接受，宋庆龄也减少了穿着旗袍的频率，不过在她看来，旗袍仍是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礼服，所以在很多外交场合，我们还是常常可以看到宋庆龄身着旗袍的身影。1955年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前，她在给友人格雷斯的信中写道：“我将出国到几个热带国家去访问，他们已经邀请我许多次了。今年我不能推辞了。我得准备一大堆服装。……过去五年里我一直穿制服，身体已经全



1956年，宋庆龄身着一件白色旗袍出访印度尼西亚。

方位地膨胀起来……想到要穿‘紧身衣’（旗袍）真让我吓坏了！我真希望我能就这样穿着制服去！”尽管信中如此调侃自己，但最终宋庆龄还是选择穿上了“紧身衣”，在照片中，我们看到这位代表着新中国妇女形象的女性依旧光彩照人。她的友人这样评价：“每当出现在公众场合特别是代表国家出访时，宋庆龄的举止和服饰都是无可挑剔的，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宋庆龄穿着旗袍出访，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一种“引领”的作用。1963年，王光美致信宋庆龄，告诉她自己将与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等国，请宋庆龄从服装、礼仪上给予一些指教。宋庆龄立即回了一封信，



1956年宋庆龄身着旗袍出席国务活动。

并让警卫秘书隋学芳带着一张单子来到锦江饭店，一条一条给王光美解释说明，这其中就有关于穿衣方面的建议。例如，她建议王光美“礼服白天穿白的，晚上穿黑的；参观的时候可以穿便鞋，正式宴会要穿有一点跟的鞋。”不久后，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访亚洲四国，身穿的正是——袭素色旗袍。

2. 追求时尚

1951年10月11日，宋庆龄致信友人王安娜，在信中，她这样写道：“德国大使馆……有很多德国代表在场。一些年轻妇女都穿着拖地的长裙。我们这儿的警卫员认为她们很浪费，浪费了不少上等丝绸和布料……我竭力向他们解释说，时尚和服饰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很重要的。有一天，我国妇女也会脱下现在的制服，穿上更为女性化的服装。”正如信中所言，宋庆龄一直认为时尚和服饰在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对着装有着自己的品位，她的服饰从不追求华美，却由内而外透出一种高雅和美感。

其实，宋庆龄对时尚始终保持着兴趣。抗战年代，宋美龄和宋蔼龄常常为宋庆龄定制服饰，这些服饰无不紧跟着时尚的潮流。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环境不同，但并不妨碍宋庆龄对时尚的追求。1951年，在给友人的信中，宋庆龄这样写道：“如看到好的服装式样，我指的是短上衣和裙子，请给我送来。我要做套衣服。记住我一定要修长的式样。很多年没有看到时装书了。听说现在流行的衬衫式样是两边下摆开衩的。是这样吗？”不过随着中山装、列宁装渐渐成为标准的服



1956年8月，宋庆龄出访印度尼西亚。



宋庆龄身着列宁装。

饰，宋庆龄也开始穿着被她称为“制服”的列宁装。尽管如此，宋庆龄并没有因此而降低自己的品位。虽然这一时期宋庆龄很少置办新衣，常常穿的都是从前留下的衣服，但她却很注重服饰之间的搭配。在出席外交活动时，她尤其注重形象得体。一次，为了搭配一件阴丹士林做的衣服，她还特地请王安娜为她在国外购买一副蓝色的太阳眼镜。

然而，随着政治氛围的变化，宋庆龄还是因自己的着装遭到非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红小兵们曾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型与穿那些资产阶级的服饰了”，对此，宋庆龄只能无奈地摇头，但从那之后，我们确实再也看不到宋庆龄身着旗袍的照片了。在1972年给邓广殷的信中，宋庆龄这样写道：“请不要再买那本昂贵的‘时尚’杂志，因为主要内容是关于女性穿衣和风尚的。你知道我们这里不赶时髦。”同年，林国才送给宋庆龄“一件非常漂亮的圆领毛衣”，但是她却“穿不出去”，因为“金光闪闪的纽扣太耀眼了”。在给另一位友人杨孟东的信中，宋庆龄则这样描述自己的外貌：“我们的外

表改变了很多——平跟鞋，不戴任何首饰。你会认不出我……我们都穿平底布鞋，体态臃肿。”她还要求友人们：“不要带给我任何种类的化妆品，因为我们这里不允许美容，也不要带花哨的衣料！我们都穿灰色、黑色或橄榄绿色的布料服装——不穿丝绸！”她向西方的朋友介绍中国的变化：“人们不再穿绸缎、好打扮，招摇过市。你会发现我们身上是没有线条的服装，茄克衫和裤子，脚踏布鞋。”虽然没有明确表达，但在字里行间我们却可以感受到这位一生爱美的女性所透露出的不满。

好在历史很快揭开了新的一页，虽然在那场大灾难中，宋庆龄失去了很多东西，她说：“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们毁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但是，毕竟，从这时起，人们又有了追求美好事物的自由。宋庆龄终于能够直言她对制服的看法，“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姑娘们打扮得更得体，不要清一色的都是长裤和衬衫”。而她自己，也重拾起往日的追求，她在信

中感谢友人送给她的布料和披肩，因为她终于可以在接待外宾时，穿上“特别宜人的服装”，她还请远在法国的友人为自己购买染发剂，并特别注明，她要的是海伦



宋庆龄身着“制服”。

娜·露本斯坦品牌的“快速染发”香波。此时的她，终于又可以给身边人提出穿衣的建议，“男人晚间必须穿黑色的，女人可以穿任何其他颜色，以显得更加出众”，“我想乳白色的套装最适合你，纯白的有点太冷”。

尽管宋庆龄追求时尚和美丽，但她从来与奢华二字无缘，她的服饰常常简洁到极点，却总是从简洁和朴素中透出端庄和高贵。她还常常自己动手，寻觅各种衣料，为自己“定制”各种衣服。一次，她得意地告诉廖梦醒，日本友人送给她的美国式羊毛短裙已经被她“倒过来改制成一条短裤”，“这样可以穿在睡裤外面，晚上起来时就不会感到冷”。



宋庆龄设计的“阔腿裤”。

晚年宋庆龄身体发福，她还自己设计了一种阔腿裤，宽大的裤脚看上去就像是裙子，同时又有裤子的方便。邓颖超看到之后也非常喜欢，还告诉宋庆龄，应该将其推广。

宋庆龄的一生跌宕起伏，人们常常会谈起她作为革命者的一面，却忽视了她作为普通女性的一面。其实，那个热爱服饰、音乐、美食，追求品味和美感的宋庆龄也许更加真实。

3. 节俭的宋庆龄

从外表看，宋庆龄美丽大方、雍容华贵。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宋庆龄十分朴素节俭，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最后。

宋庆龄的一日三餐，朴实简单，与普通人没有多大的区别。早晨仅吃两片面包和一杯咖啡，有时则嘱咐工作人员去买些大饼油条当早餐。午餐吃米饭，两荤，一蔬菜，一汤。由于她喜欢吃鱼，两个荤菜中，总有一个是清蒸或红烧的鱼。晚餐只要一碗小米粥或者一杯酸奶就够了。她自己要求，菜的分量不要多，因为多了吃不了，倒了很可惜。有时剩下的菜多了，她就关照保姆钟兴宝留着下顿吃。宋庆龄常常这样对钟兴宝和李燕娥说：“我们生在福中要知福。”她还常用这样一句方言告诫她们：“有福守福，不要作孽。”意思是要珍惜幸福，不要白白糟蹋和浪费了得来的幸福生活。有时，工作人员炒了一些青菜，认为是粗食，不拿给宋庆龄吃。宋庆龄知道了，就让钟兴宝去盛来给她吃。她曾不止一次地对钟兴宝说：“你不要以为炒青菜不行，炒青菜我也要吃，里面的营养价值可高呢！鱼翅海参听听很了不起，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宋庆龄平时最爱吃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雪里红”腌咸菜。这种咸菜又经济又方便，每年雪里红上市的时节，她就要让钟兴宝亲自腌上满满两大缸，放进冷库里，待熟后，慢慢吃。

宋庆龄穿衣也极爱惜。她家里备有家常和外事“两套”服装。在家里时，就穿一般普通的衣服。只有遇有外事活动，她才经过选择，穿上质料好的衣服。但是，当外事活动结束后回家后，她就又马上脱换上家常便服了。一次，宋庆龄刚从外面回家，脱下脚上的长统丝袜时，发现这双丝袜上跳了长长一路的丝。为此，她不停地“啧啧”惋惜着。钟兴宝对她说：“太太，一双丝袜没什么，这双放起来算了，不要穿了。”宋庆龄连连摇着头对钟兴宝说：“不能，不能，这双袜跳了一路丝，



宋庆龄的“八卦衣”。

龄常常深夜起床工作，夏凉冬寒，生怕她受了凉，就提出建议，要给她做一件御风寒的氅衣。宋庆龄高兴地同意了，但是，却找不出现成的整料来做，于是，两人就一起翻找出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普通布料和织锦缎料子，拼凑着做了件特殊的氅衣。乍一看，这件衣服很漂亮，其实却是由二十六块衣料拼成的“八卦衣”，而且，衣服的袖口周边还有布条包着，如果脏了，还能拆下来洗涤后再重新缝上使用。宋庆龄常披着它笑着对钟兴宝说：“兴宝，你别小看这件‘八卦衣’，披上它还挺御风寒呢！”宋庆龄十分喜欢这件“八卦衣”，每年冬天往返京沪之间，都随身携带，经常穿在身上保暖御寒。

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的寓所，宋庆龄家里的家具都是不成套的，上海寓所的家具有很多是宋庆龄从宋家老宅带来的，还有一些则是寓所管理员去旧货市场“淘来”的，一用就是几十年。而北京寓所的家具都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配发的，款式和颜色都配不上套。梳妆台镜子的水银都脱落了，她就将就着照一半镜子，台灯的灯罩破了，

补一补还可以穿。外事不穿，家常穿穿还是行的。”后来，宋庆龄果然还经常穿着这双袜子。

宋庆龄家常穿的衣服、鞋子，许多都是钟兴宝缝制的。一次，钟兴宝发现宋庆

她就和保姆一起，用旧床单缝制一个，就连桌脚边竹篾编的字纸篓，因使用年头过久，边口都散开了，她仍在用着，舍不得丢掉。为了保护这些家具，宋庆龄还和钟兴宝一起为床头、椅子都缝制了布套，套在上面，用以保护家具，延长寿命。

宋庆龄对任何东西都十分爱惜，她随身用的手绢破了，就打上补丁接着再用。一直用的一套梳妆用具还是母亲给她的陪嫁品，用了50多年仍保持完好，没有损坏。钟兴宝刚到宋庆龄身边时，看到她头上一直佩戴着一个乌黑油油的发夹，她心想，这东西一定很贵重，至少也是乌金的。可是后来她才知道，这哪里是什么贵重品，原来是一个普通的钢针做的发夹！

在上海寓所的打字间，甚至专门有一处“藏宝之所”，用来储存废旧物品。日常使用过的空瓶、空盒和礼品盒上的红绸带，使用过的旧信封、包装纸、绳子等等，宋庆龄都不会随意丢弃，而是放在打字间的浴缸里，堆得满满的，再拉上浴帘，别人根本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宋庆龄告诉李燕娥，这些东西都要收集起来放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用。每年圣诞节，宋庆龄都会在家里准备一棵圣诞树，把它打扮成火树银花，而挂在树上的一条条银丝带，就是由她所吸的香烟盒中的锡纸剪成的。

那时，宋庆龄经常往返于北京、上海两地，工作人员发现，每年冬天来临，宋庆龄都是选择在上海家里居住过冬，宋庆龄对寓所管理员周和康说：“周同志，你可晓得，北京寓所冬天取暖一个月的用煤量，就足够我们上海家里整整一个冬季用了，所以，我在冬天就住到上海家里来，这样可以多节约一些煤炭。”大家这才知道，原来宋庆龄是为了节约煤炭，才不辞劳苦返回上海居住的。

宋庆龄喜爱读书，但是买书时，也会精打细算。1967年5月，周和康接到宋庆龄秘书来信，请他帮忙购买中华书局辞海编辑部编著的《辞海》第一分册。随信，宋庆龄还亲自写了一张批条：“关于买辞



1965年，宋庆龄与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孩子们在上海寓所迎接新春。

典那要50元太浪费，……买便宜的一套吧，只要字大，我看方便就好了。”遵照宋庆龄的指示，周和康购买了一套20余元的简装《辞海》，由工作人员带往北京供宋庆龄使用。

1955年，新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考虑到宋庆龄同志作为国家副主席，住在淮海路的房子过小，不够她公务使用，准备为她在上海新建一座大的住宅。工作人员向宋庆龄转达了这个意思，宋庆龄说：“这房子够我使用的，绝不要为我新建住宅。我很喜欢这所住宅，院子里香樟树绕了一圈，使院子里的空气格外好，它对人的肺健康很有益。”婉言谢绝了。1959年，宋庆龄由北京方巾巷迁至西河沿新居，因为房子刚刚粉刷，有些潮湿，引发关节疼痛。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党中央仍然考

虑为宋庆龄修建新居。为此，宋庆龄于1961年2月8日致函王光美：“关于北京西河沿我住的房子问题，……该房子去年因新修好即迁进，比较潮湿一些。经过一段时间，我想今年恐不至像去年那样潮湿了。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正在需款，如另外建造房子，又需费一笔款。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故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

1962年，周恩来受党和政府的委托，亲自主持在北京后海北沿一



北京宋庆龄故居。

座已经荒芜的旧日王府辟出一处幽静花园，为宋庆龄新修了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寓所。第二年春天，宋庆龄迁入新居。虽然这里环境优美，但是宋庆龄的内心一直很不安，她觉得这个房子太大了，在给美国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宋庆龄写道：“……我住在醇亲王府里，溥仪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确实享受着‘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直到生命的最后，宋庆龄还惦念着为国家节约资源，她说，我总要回家退休的，一人独占二住宅实在不好，浪费国家很多钱！

4. 顽疾荨麻疹

和普通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宋庆龄常常为病痛所困扰。困扰宋庆龄最久的疾病是荨麻疹，从30多岁起，这个顽疾几乎伴随了宋庆龄大半生。

荨麻疹，俗称风团或风疹块，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宋氏三姐妹都患有这种皮肤病，只要精神紧张或过于劳累就容易发作，宋庆龄第一次有记载的荨麻疹发病就是源于“敌人”的造谣中伤。

1927年，宋庆龄为了完成孙中山的遗愿远赴苏联，探寻救国道路。然而，就在她抵达苏联后不久，美联社向全世界广播了一条电讯：“伦敦，9月28日（美联社讯）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爱情之神看来再一次把战争之神争取过来了。伦敦《每日邮报》驻里加记者援引一条据说是苏联官方的电讯说，前国民党外交部长陈友仁 and 国民党之父孙中山的遗孀已在莫斯科结婚。……这家报纸报道说，这对



宋庆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右为陈友仁。

新夫妇想要用发动一场新革命的办法在中国度过他们的蜜月，还说第三共产国际将资助他们的活动。”

宋庆龄听到这个谣言，当即晕厥过去。恶毒的谣言不仅伤害了宋庆龄的内心，也严重影响了她的身体健康，由于精神紧张，情绪激动，宋庆龄的颈上发了一圈荨麻疹。虽然后来谣言很快被破除，但是宋庆龄这次荨麻疹发病一直持续了很久。

1949年，宋庆龄荨麻疹再次发作。由于没有针对这种病症的特效药，宋庆龄只得服用苯纳德雷，这种药虽然不能止痒，但却让宋庆龄昏昏欲睡，睡着后自然也就感觉不到痒了。对这样的治疗方式，宋庆龄自然不满意，她抱怨道：“这养成了一种很不好的习惯，使我昏昏沉沉。我真不喜欢这个样子。”她向王安娜诉苦：“讨厌的荨麻疹必须彻底根治才好。医生说我的整个生活方式都需要改变，包括居住的地方。但是，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大约一周后，宋庆龄的荨麻疹终于得以缓解，虽然服用苯纳德雷让宋庆龄变得“呆滞和反应迟钝”，但是荨麻疹终于慢慢退下去了，不像之前那样痛苦万分。

几个月后，荨麻疹再次发作，医生不得不每周给宋庆龄注射三次药剂以缓解症状。让宋庆龄没想到的是，虽然坚持每周注射三次药剂，到了1950年2月底，荨麻疹竟然又再次发作。因为从未在冬季发过病，所以，当宋庆龄最初发现自己全身布满了发痒的红疙瘩时，还认为是疥疮。为了治病，宋庆龄“能看的医生都去看了”，但医生们得出的结论却让宋庆龄哭笑不得：他们断言，宋庆龄此次发病是由于“害怕”而造成的。因为此时的上海正受到国民党空军空袭的威胁，医生们的言下之意就是宋庆龄因为害怕空袭而发病。宋庆龄只好无奈地调侃：“你知道，我住在最安静的地方，几乎听不见任何车辆经过的声音，也听不到木匠、泥瓦匠在我家园子里干活的声音。至于说到思绪，谁也无法阻止它，即使是我住在延安的黄土窑洞里……”

在此后的几年中，宋庆龄的荨麻疹每年都会发作，常常会影响宋



宋庆龄在工作。

庆龄参加各项活动。1951年，宋庆龄致信王安娜，告诉她，将有外国友人前来“观看我们儿童的表演”，“可惜，我因荨麻疹不能参加。”1952年，宋庆龄再次致信王安娜，建议她去观看“朝鲜芭蕾舞团的演出”，而她自己则无法前往，因为，“这些天，一到晚上我就受皮疹的困扰”。

另一些时候，过于频繁的活动，又会诱使宋庆龄的荨麻疹发作。1952年9月至1953年2月，宋庆龄经历了连续5个月的各种会议和视察，每天忙到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她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上午是会议，下午是会议，晚上还是会议，这就是我忙碌的时间表，因此当我回家时，我所能做的就是爬进浴室，滚到床上。但是即使在床上，我也不能休息，还得看各种文件和报告……”不久之后，在一次参观活动后，宋庆龄的荨麻疹发作，同时还伴有高血压，她不得不接受烤电治疗。这一年的8月11日，在观看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演出后，荨麻

疹又伴随着痲子再次发作，这次“可怕的经历”，让宋庆龄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外出参加活动了。

“文革”开始后，宋庆龄虽然自己被列为“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的第一位，但是她的亲友却纷纷遭到迫害，甚至父母的墓地都遭到破坏、亵渎。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得宋庆龄的荨麻疹再次复发，而且发作的频率也更为频繁。1969年初，在荨麻疹、关节炎、高血压和高烧的轮番打击下，宋庆龄几乎四个月没有下楼。此后，荨麻疹的发作越来越频繁，整个1971年，荨麻疹几乎就没有消退过。

1971年荨麻疹的恶化其实源于一次“医疗事故”。这一年的1月，宋庆龄高烧不退，一位医生给宋庆龄开了一天8片的土霉素，但却没有注意到，在宋庆龄的病历上早已注明，宋庆龄对磺胺类药物有过敏反应。48小时内服用了24片土霉素后，宋庆龄发生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全身发水疱，瘙痒间歇性一天发作两次。

进入冬季后，北京干冷的气候让宋庆龄的荨麻疹和风湿痛更加难熬，只能依靠安眠药入睡。由于对北京的医治方式不再抱希望，宋庆龄决定采用上海的治疗方法：将药物直接打入静脉以驱除她身体内的毒素。这种注射每次需要2.5小时，一共需要注射30次，在此过程中，宋庆龄还必须躺着，纹丝不动，否则，针头可能滑进去，造成“大问题”。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又从北京派来两位医生，确保宋庆龄在注射过程中不会发生意外。宋庆龄将这种治疗方式视为自己得以治愈的唯一希望，虽然每次静脉注射都很痛苦，又非常疲劳，但她仍咬牙坚持着，因为人们告诉她，这是“治疗皮肤过敏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在治疗的初期，效果十分明显，宋庆龄发现自己身上“那些暗红色的、难看的疱块已开始消失”，在一段时间里，荨麻疹也没有再次发作，宋庆龄认为，“苦难最后总算到头了”。

让宋庆龄没想到的是，在打完了24针静脉点滴之后，宋庆龄感到的只是疲惫，而非想象中的康复。更让她备受打击的是，到了1973年

的三四月间，宋庆龄的身上再次发满了红疱，这一次，情况更加严重，这些水疱竟然有樱桃大小！宋庆龄感到沮丧和绝望，也对西药彻底失望。宋庆龄告诉廖梦醒，当她挽起裤腿让朋友们看看自己大腿上一串串像樱桃般的红疱时，她们都害怕得尖叫起来。宋庆龄写道：“如果我是一个不那么坚强的病人，确切地说是牺牲品，也许我早就自杀了。”

1973年5月，为了治愈宋庆龄的皮肤病，国务院选派了几位皮肤科专家赴沪为宋庆龄诊疗。面对宋庆龄饱受折磨的皮肤，他们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只能尝试各种各样的药物。宋庆龄仍然日夜忍受着红肿的疱疹和瘙痒之苦，她不愿会见任何客人，只希望医生们能早日找到治愈的方法。经过专家们的努力，宋庆龄身上的疱疹终于开始慢慢消退，但瘙痒仍未停止。专家们认为潮湿、多雨的上海不适合神经



晚年的宋庆龄。

性皮炎的恢复，建议宋庆龄离开上海，到北方继续治疗。宋庆龄听取了医生的建议，于6月20日返回北京。

宋庆龄到达北京后，邓小平、周恩来、邓颖超先后表示慰问，医生们对她的治疗也更加规范。每周会有五个大夫为宋庆龄进行会诊，再由两个医生和一个护士为宋庆龄进行治疗：每天早晚各进行一次药浴，之后擦上药膏，为了让药膏在身上维持更久一些，还要再贴上一块块纸片。为此，宋庆龄不得不每天换两次衣服。随着疱疹慢慢退去，瘙痒得以缓解，宋庆龄的心态也轻松起来。到这一年的8月，折磨了宋庆龄两年又八个月的皮肤病终于基本痊愈，直到两年之后，宋庆龄的荨麻疹才再次发作。

1978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宋庆龄再次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文革”后，宋庆龄参加人大会议。

工作中。她每天的工作排得满满的，“我要阅读大量的资料，以使我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和了解国家的巨大发展”。这个时候，宋庆龄已是85岁高龄，越来越繁忙的工作却影响了宋庆龄的健康，2月26日至3月5日，宋庆龄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并在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就在这次会议后，宋庆龄的荨麻疹又发作了。由于年事已高，宋庆龄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已无法根治，她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意志与疾病作斗争。

1980年12月，荨麻疹再次发作，持续了近三个月仍未消退，宋庆龄在给多位友人的信中提到了这次发病。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宋庆龄写道：“我已有好几个星期什么也不能做，皮肤痒症一直在折磨我。”在给杨小佛的信中，宋庆龄告诉他：“我已患荨麻疹两个月了，它使我不能工作。浑身发痒而看来无药可治。我已试过一切药物，甚至中草药，但毫无效果。”在给廖梦醒的信中，宋庆龄显得非常沮丧：“自从去年12月以来，我的老毛病荨麻疹一直困扰着我，几乎无药可治。我现在还在吃中药，但是也不能减轻那可怕的刺痒。处在这种痛苦的境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也不允许我见朋友，即使像邓大姐这样的老朋友也不能见。”宋庆龄并不知道，这次荨麻疹的发作其实是她人生中最后一次面对这个可怕的疾病。1981年3月9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拿东西时跌倒，当天下午，开始发高烧，五天后，宋庆龄被确诊为“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两个月后，该疾病夺去了宋庆龄的生命。

5. 乐观的心态

尽管晚年宋庆龄常常为疾病所困扰，很多时候，她不得不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她也曾因为这些疾病而焦虑、沮丧，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宋庆龄总是以乐观的心态来面对这些疾病。

晚年宋庆龄眼睛和关节都不好，走路不便，体重又增加了不少，所以时常会摔倒，由于身体虚弱，骨质疏松，每次摔倒，宋庆龄或多或少总会受伤，还时常骨折，时间长了，新伤老伤给宋庆龄带来了不少痛苦。1964年，宋庆龄跌了一跤，摔断了右腕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活动，连生活也不能自理，不得不让一位护士照料。一位二医大的专家为宋庆龄做了接骨，虽然骨接好了，但手依然无力，而且手腕骨凸出。宋庆龄就请那位接骨的医生再来看看，不料医生却说：“你如



宋庆龄晚年留影。

果要漂亮，可以将凸出的骨头锯掉。”宋庆龄回答：“我主要是手无力，拿不起茶杯，不是要什么漂亮。”结果医生也没有办法。宋庆龄对此非常不满，她对秘书李云说：“你看气人不气人，说我要漂亮，可以将手腕骨凸出部分锯掉，这个人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来？”后来，周恩来得知此事，马上通知卫生部领导来上海，亲自坐镇为她的手伤进行会诊和治疗。虽然经过专家的诊疗，宋庆龄的手腕情况有所好转，但最终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宋庆龄写字都受到一定影响。1972年，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的食指几乎不能握笔，这是几年前我的腰摔伤时受的伤，现在变得僵直……”直到1978年，宋庆龄还曾提到这次受伤对自己的影响：“……不断有人请求我写文章、题词。我不擅长书法，特别是我那受伤的右手腕还不跟我合作。”尽管如此，遇到题词的要求，宋庆龄很少推托，还是坚持着用她受伤的手腕题写，有时怕写得不好，就题写好几份，以供选用。她时常自嘲自己的字不



晚年的宋庆龄。

好看，但只有熟悉她的人才知道，那其实是当年摔伤的后遗症。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荨麻疹反复发作，皮肤的瘙痒让宋庆龄夜里睡不着觉，白天浑身难受，有时，宋庆龄也会心情灰暗，在给友人的信中，她这样写道：“我还得与荨麻疹或者叫皮炎作斗争，它使我浑身上下都刺痒，甚至晚上也是如此，使我脾气也变得暴躁了。当一个人为了疾病所折磨时，活得太长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这样的時候并不多，在大多数时候，人们看到的宋庆龄还是像从前那样乐观、幽默，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忙碌不止，她甚至调侃自己像是“一头老牛”。只有到了晚上，她才会独自面对自己可怕的皮肤病，用硼酸一遍遍清洗患处，或是在身上涂满药膏用以止痒。

事实上，在宋庆龄给友人的信中，在谈及自己的疾病时，宋庆龄常常都选择用一种自嘲的语气调侃自己，还总不忘针砭时事。阅读这些信时，人们会感到，虽然疾病折磨着宋庆龄，但宋庆龄却从来没有屈服于病魔。

“上海的天气对于克服我的反动派敌人——风湿病正在产生良好的作用”。

“过去三个月，我被神经性皮炎弄得动弹不了，全身都有，白天黑夜都痒得难受，所以我的时间都用来在身上涂……那些不管用的药。”

“我从头到脚都浮肿，两眼充血。每天有三个大夫和一个护士给我治疗，他们不允许我会见任何人。我的样子很可怕，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眼睑肿得会使你吓一跳。”

“……现在觉得好些了，虽然冠状动脉有点问题、关节炎也总好不了——年龄所赐，我的老天爷！”

在大多数人的心中，晚年宋庆龄始终慈祥可亲，其实，宋庆龄常常是带着新病旧痛坚持工作、参加活动，她总是尽力不让这些疾病影响到自己的工作，也不希望自己的疾病影响他人的情绪。她的好友爱泼斯坦写道：“在公共场合，她从来不提她的病。……不论她怎样觉



宋庆龄在工作。

得不舒服，她总让自己显得平静和愉快。”

即使承受着病痛，她还用这样的语言鼓励自己：“经过精心治疗，我现在恢复得很快。不管我能否活到 90 岁，但我看目前还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世上有这么多的东西需要去学习和观察。”

在给廖梦醒的信中，宋庆龄吐露了自己的心愿：“说真的，我真希望能回到年轻时代，再多做些工作。”

6. 热爱烹饪和美食

在宋庆龄的藏书中，有各式各样的菜谱：《新雅粤菜馆菜谱》《犹太食谱》《中国菜谱》《中国食谱五十种》等等，其实熟悉宋庆龄的人都知道，她对美食颇有研究。偶尔下厨，做上一二个拿手菜，和好友一起分享，这是宋庆龄的一大乐事。

宋庆龄的家庭背景和她早年在海外的生活经历让她对西式餐饮情有独钟，20世纪20年代生活在德国期间，她不仅学习德语，学唱德国歌曲，还爱上了德国的特色食品——“薯仔煎饼”，并且学会了自己烹制。十多年后，在战时的重庆，宋庆龄仍对这种食物念念不忘，她经常兴致勃勃地打电话给王安娜：“请把你的煎锅带来！我们还是做薯仔煎饼。”王安娜发现宋庆龄特别喜爱吃这种煎饼，她觉得一定是这种饼让宋庆龄回忆起了当年在德国的生活。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开展救济福利工作。那时，宋庆龄每日的工作繁忙而琐碎，常常还会受到国民政府的阻挠，而美食则成了她枯燥乏味的生活中最好的“调味剂”。

宋庆龄常常约请王安娜等好友到自己的厨房“比试手艺”，细心的宋庆龄每次都会提前一天问好王安娜打算做哪种菜，然后亲自将原料备齐。和好友在厨房



宋庆龄与王安娜。

里大展身手，是宋庆龄最开心的事情，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那可以帮助你忘却一切。”野餐也是宋庆龄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她会为此进行精心的准备：带上最大号的保温瓶，装上足够的冰块，买一些酱菜、泡菜和樱桃，亲手制作“很好的甜食”，再请朋友带上一些德国薄煎饼。

朋友们知道宋庆龄喜爱美食，总会寄给她各种各样的食物，每次收到自己喜爱的食物，宋庆龄都非常高兴，而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这些美味与朋友们一起分享：

“别忘了二十六号六点或六点半来吃冷餐，这次没有肉丸子，我想大家会喜欢咖喱鸡的，换换口味嘛。我自己两年没吃咖喱鸡了。叶同志从广东给我寄来一些，说不定是从我的故乡海南来的。得庆祝一下……”

“谢谢你准备为我查询‘枫叶糖浆’……我拿到以后准备送你一些，据说很好吃。这是我的朋友寄给我的，他们都是美国弗蒙特州的土著人。”

“谢谢你送给我的德国奶酪。你应该等我们在一起时分享，一个人吃没有趣味……”

有时，为了美食，宋庆龄甚至会“敲诈”



上海宋庆龄故居厨房中保存的煤气灶和烤箱。

一下自己的朋友们。一次，宋庆龄打算举办一个庆祝活动，她特地提醒一位老朋友别忘了兑现诺言，“送我们一些酒”，还有“鱼子酱也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渴望的东西”。宋庆龄风趣地总结：“‘摆脱贫困’可是我们的纲领之一哟！”

新中国成立之后，环境宽松了，宋庆龄有更多时间和更好的条件来当一位“美食家”。在设施齐全的厨房里，她常常邀请友人们前来“比试一下手艺”。在众多美食中，宋庆龄对德国菜更为偏爱，她常常和王安娜一起尝试各种德国菜。宋庆龄还喜欢亲手制作各式果酱，在北京寓所的花园里种着杏树和葡萄，每年杏树结果，宋庆龄就采摘一些，洗干净敲碎后，连皮带肉煮烂，加上豆腐和糖，熬成酱汁，其味芬芳又酸甜可口。到了葡萄成熟时，宋庆龄也会采摘下来，连皮带核煮烂后加上糖和冻粉，制成葡萄果酱，其色透明，味道也十分可口。



宋庆龄亲自采摘葡萄。



宋庆龄在北京方巾巷寓所接待王光美和她的孩子们。

举办聚会、邀请朋友们到家里来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也是宋庆龄的一大乐事。有时，与朋友商议聚会的事情时，宋庆龄甚至像孩子一样兴奋。一次，宋庆龄为了给爱泼斯坦举办一个“出其不意”的聚会，她写了一封信给王安娜，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能在星期天为艾培举办一次出其不意的聚会，我将感到特别高兴。下午六点如何？可是，我们邀请谁呢？他又喜欢谁呢？耿丽淑、谭宁邦和顾锦心。还有谁呢？或者要不要举办？弄个蛋糕怎么样？你能在我这儿烤一个吗？……你能开个菜单吗？光是面条、鸡、色拉或者弄些西餐？如果你有时间，请过来，我们亲自动手，可好玩呢。或者让艾培自己做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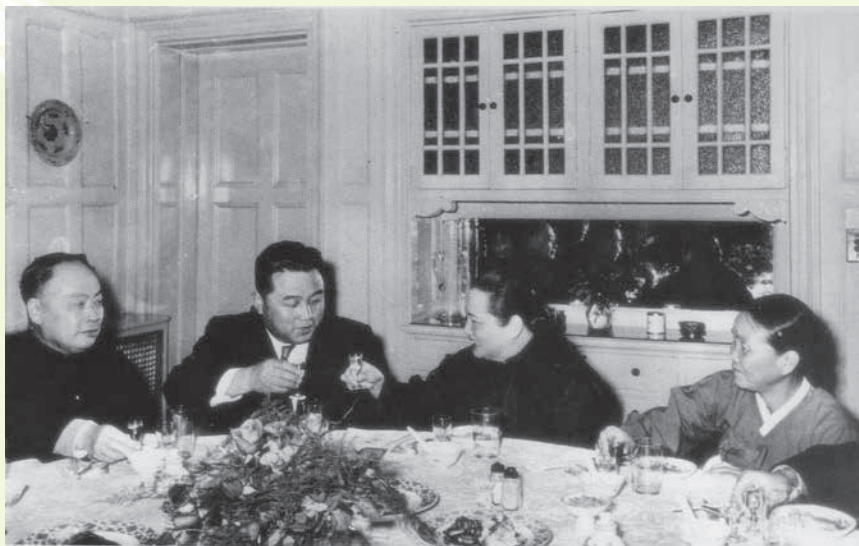
在宋庆龄的通信中，记载了许多关于食物的趣事。有一次，宋庆龄做了许多炸饼圈，她觉得这种饼圈非常好吃，便多做了一些打算“留到星期天做早饭”，一边喝咖啡一边“饱餐一顿”。不料，这种食物没过几个小时就返潮变软了，到了星期天，宋庆龄看到那“黏糊糊、软皮皮的东西”时大失所望，只能将就着用来填饱肚子。

宋庆龄的信中还有许多对美食的评价，她常常会赞美自己喜爱的食物：鱼子酱、香醋鲱鱼卷、姜饼、俄国干酪、日本酱菜、日式牛肉火锅、爪哇咖啡、芒果……，宋庆龄最为偏爱的是螃蟹，而且在她看来，阳澄湖的螃蟹是“最棒”的。不过严重的皮肤过敏让宋庆龄每次吃螃蟹都要付出发病的代价。即便如此，她依旧无法抵抗美味的诱惑，常常先吃下抗过敏的药，再冒着发病的危险一饱口福。宋庆龄不仅自己爱吃螃蟹，还常常把从上海带来的螃蟹分送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王光美对此印象很深，她回忆说：“当时我们子女多，孩子的伙食并不太好。每次吃到她带来的大螃蟹，大家都很开心。”

7. 宋庆龄的待客之道

对宋庆龄来说，美食不仅可以与朋友们一起分享，也是最好的待客之物。不论在北京还是上海的寓所，宋庆龄都经常举行家宴招待各国宾客。如果是熟悉的客人，宋庆龄一般会亲自拟定菜单，有时即使是由厨师拟定的菜单，宋庆龄也总会亲自审阅，一遍遍修改，尽量满足客人的口味。上海宋庆龄故居至今还保存着 1958 年 12 月 5 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宴请朝鲜首相金日成的宴客菜单，这张菜单由当时一位来自锦江饭店的厨师拟定，宋庆龄亲自审阅，根据朝鲜客人的喜好，将其中的“盐焗鸭”改成了“广东烧鸭”，“干烧闽虾”换成了“油炸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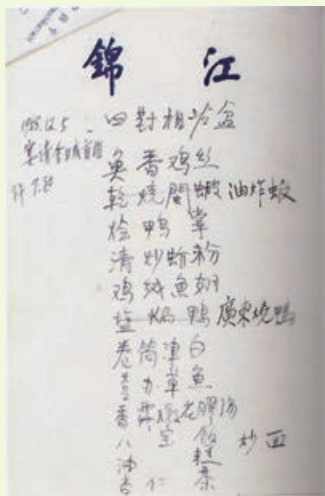
宋庆龄的家宴中，还有一项特殊的“礼遇”——女主人亲自下厨。而关于她的拿手菜，友人们有好几种说法，陈燕记得，宋庆龄做的春



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宴请朝鲜首相金日成。



宋庆龄与侯波。



宋庆龄的宴客菜单。

卷和红烧大虾非常美味；沈粹缜则说，宋庆龄做的鲫鱼塞肉是公认的好味道；而张珏则回忆，宋庆龄烧的海南岛味的红鲤鱼和杏仁鸡非常可口。不过，对宋庆龄的厨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摄影师侯波。

1964年，宋庆龄与侯波在昆明住了36天，她就为侯波炒了36道菜，没有一次重样，菜菜手艺叫绝，菜菜好滋味。而侯波，始而吃惊，继而激动，终于彻底叹服宋庆龄的厨艺。

宋庆龄不仅厨艺精湛，而且深谙待客之道，她的细心周到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自叹不如。除了上面提到的拟定菜单之外，座位的安排、环境的布置、桌面的装饰、餐具的选择、鲜花的摆放、水果和酒的选用，宋庆龄都会亲自过问。有时，宋庆龄还耐心地提醒工作人员：“千万不要用右手上菜，因为你在背后上菜，假如客人正巧要夹菜，就会翻在客人身上。”

餐桌上的宋庆龄风趣幽默，客人们时常被宋庆龄逗得前仰后合。一次，一位英国客人前来拜访，宋庆龄在家里准备了一个小型的中式宴会接待他，本已万事俱备，不料突然有人赶来报告她：这位客人是位素食者。在匆匆忙忙撤掉肉食换上几个素菜之后，又传来了更坏的消息：他是一位只吃生菜的素食者！宋庆龄举起双手大声说道：“那



1980年10月27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设宴为老朋友马海德祝贺生日。

我们就把他赶到外面草地上去吃草吧！”逗得大家忍俊不禁。后来，宋庆龄还是赶做出一个“沙拉”，才让这位客人免于“吃草”。

而有时，宋庆龄的幽默又别有深意。一次，宋庆龄邀请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人员到家里吃饭，餐桌上，宋庆龄突然夹起一个鸡腿放到了一位同志的碗里，笑眯眯地说：“吃鸡腿，可以跑得快些。”原来，这位同志做事非常稳重，但是个慢性子，做事情始终不紧不慢。在座众人听了宋庆龄的话，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还有一次，宋庆龄宴请一批海外友人和侨胞，厨师端上来一碗酸辣汤，汤中的南豆腐和鸡血切成小长条，切得很细。这道汤端到席上，绿色的几叶香菜飘在面上，又有红、白长条，其香入鼻，其味既不太酸也不过辣，客人们纷纷赞不绝口，还有人说：“颜色配得真好！”宋庆龄一面手持汤匙为客人盛汤，一面说：“请勿客气。”待客人都用了汤，宋庆龄面带微笑用流利的英语说道：“这碗汤里，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有人叫它‘国共合作’汤……”客人们听了宋庆龄的介绍，



宋庆龄和外国朋友在一起。

都露出会心的微笑，大家知道，这个菜名的背后，是宋庆龄对国共合作、两岸统一的深深期盼。

爱泼斯坦在他所著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一书中，这样评价宋庆龄的家宴：“这样的家庭式聚会会使她同别人的交往——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变得温暖和活跃。在同外国人交往中，这样的聚会为她在人民外交中的作用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活动空间。”在宋庆龄的餐厅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品尝各式菜肴，交流烹饪技巧，事实上也是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国友人们总在宋庆龄餐桌上看到从未见过的中国菜，这时，宋庆龄就会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解释：什么是“杏仁豆腐”，什么是“杏仁茶”……有时，她还会应客人的要求，把菜谱和各种“秘方”写出来送给客人。而各国的食谱也是宋庆龄最喜欢的礼物之一，有时，外国友人们会带来自己家里做的点心、蜜饯、腌菜之类，宋庆龄会请她们把详细的做法告诉她，日后她就找时间卷起袖子到厨房里亲自试试。

宋庆龄十分热衷于将中国的饮食文化介绍给外国友人，她甚至设想在自己的厨房里办一个“学习班”，和友人们一起学做中式菜肴。一次，她听说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夫人非常喜欢中国菜，便专门找了英文版的中国菜谱送给她。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曾提出，烹饪不止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艺术和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志。他曾说：“中国有了4000多年的文明，我们食饭的文化是比欧美进步得多，所以我们的粮食多是靠植物。”在宋庆龄看来，小小的餐桌，既有美食的分享，也是文明的传承。



1957年4月24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设宴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刘少奇出席作陪。

宋庆龄的兴趣爱好



慶齡

兴趣爱好

宋庆龄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她爱好广泛，她喜爱音乐、喜爱电影、喜爱书画、喜爱读书，工作之余，弹上一曲钢琴，是她最好的放松。宋庆龄也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在上海寓所，她曾经养过鸽子，养过猫，还养过白鹅，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她也会亲自悉心照料。看起来文静的宋庆龄也热爱运动，年少时，她爱打网球；结婚后，她常常与孙中山一起打门球；晚年，与友人一起打康乐球是她的一大乐事。

1. 宋庆龄与音乐

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收藏着五百余张珍贵的黑胶唱片，这些唱片中有古典音乐，也有现代歌曲，有西方歌剧，也有中国民歌，有《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这样的世界名曲，也有极富时代特色的《红色娘子军》。这些唱片的主人，正是宋庆龄。

当宋庆龄还是孩子时，她的父亲便培养起她对音乐的爱好。每到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父亲宋耀如会用男中音一首接着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



宋庆龄收藏的唱片。

一首给孩子们唱歌。有宗教歌曲，也有民歌和通俗歌曲，这些都是宋耀如早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谋生时学来的。宋庆龄直到八十高龄，在一天辛勤工作之余，还常常在卧室里一面弹钢琴一面哼唱着小时候听父亲唱的这些歌曲作为休息。在宋庆龄的上海和北京两地的寓所，至今还保留着宋庆龄的父亲留下来的《纳什维尔第一卫理公会圣公会教堂青年赞美诗集》《宗教歌曲及独奏曲》，还有三姐妹自己的歌曲集“Is It True What They Say About Dixie”（《他们说的关于迪克西的话是真的吗？》）、“Everybody Loves Somebody”（《人人都有所爱的人》）等。

除了唱片、曲谱，宋庆龄的寓所中还保留着她用过的钢琴和音响。宋庆龄住过的地方，几乎都会有钢琴做伴，在宋庆龄北京寓所的卧室里，有一架“施特劳斯”牌钢琴，而在上海寓所的办公室里，则放着

一架香港产的莫里森（MORRISON）牌钢琴，这是一架立式低背钢琴，由香港钢琴公司1937年生产。宋庆龄从不在外人面前弹钢琴，所以，只有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听过她的弹奏。保姆钟兴宝回忆说，在宋庆龄手指头还灵活的那些年里（后来一次摔伤造成的骨折影响了宋庆龄的手指），她常常会到书房里弹奏钢琴，她弹得一手好钢琴。宋庆龄弹奏钢琴时，钟兴宝就或站或坐陪在一边，随着她的示意翻动曲谱。钟兴宝不懂音乐，只是觉得宋庆龄弹奏的钢琴声音很好听，后来，她请教了熟悉曲调的同志，才知道，原来宋庆龄弹的是贝多芬的乐曲。到了星期天，工作人员大都回家了，宋庆龄弹奏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甚至一连弹上几个小时，还意犹未尽。有时，宋庆龄晚上睡不着，也会起来弹奏钢琴，一次，宋庆龄凌晨一点多起来弹了一会钢琴，保姆顾金凤不放心，便陪在宋庆龄身边，宋庆龄满怀歉意地说：“阿金啊！

对不起，你被我拖死了。”据宋庆龄的秘书张珏回忆，那时，宋庆龄弹的最多的曲子是《蓝色多瑙河》和《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有钢琴为伴，宋庆龄便不会感到孤独。

在宋庆龄上海寓所的客厅里，有一台硕大的机器，许多人一眼看过去，以为是个柜子，其



上海宋庆龄故居办公室内的钢琴。



宋庆龄上海寓所客厅中的音响。

实，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自行设计生产的第一代电子管收音机，具备收音、录音和播放唱片三种功能，1958年6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为庆祝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特地赠送给她使用，宋庆龄经常用它来播放唱片，欣赏音乐。

对宋庆龄来说，音乐不仅可以陶冶情操，放松心情，还承载了自己的许多回忆。在宋庆龄与孙中山相伴度过的十年间，两人都喜爱欣赏音乐，一起买了许多胶木音乐唱片，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在战乱年代，这些唱片也渐渐散失了。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有了一处真正属于自己的寓所，她便经常托友人为自己购买年轻时爱听的唱片。

1951年6月，宋庆龄写信给友人王安娜，告诉她：“我喜欢音调优美的音乐。……请设法为我买以下外国唱片：《啊，甜美神秘的生活》《可怜的蝴蝶》《我想过个白色的圣诞节》《晚安》，以及宝拉·纳格瑞唱的所有歌曲。还有施特劳斯的唱片，名为《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和《漫漫乡间路》。”“感谢你为我挑了那些唱片……如果你认为有可能弄到马琳·迪埃特里奇唱的《蓝色的安琪儿》这首歌，请一定不要放过。它发行的时候我正在柏林，因此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我一见到就立刻放了起来，回忆起许多在柏林时的美好时光，那时去看正在放映的那部电影，看电影里的马琳和艾米尔·詹宁斯。啊，我们是怎样在阁楼里咯咯地笑那个害相思病的教授的滑稽举动！”“当然我更喜欢它的歌词，而不是音乐，因为歌词更有趣。我也喜欢马琳·迪埃特里奇的英语发音，非常有趣。她把‘Moth’念成‘Muth’！把‘Lola’念成‘Lolar’！”不过让宋庆龄觉得惋惜的是，王安娜带给她的这张唱片太旧了，有许多裂缝，即便如此，宋庆龄仍不肯放弃。为了听完这张唱片，宋庆龄干脆站在机器旁，一边听，一边时不时把唱针放回正确的音轨上！

“文革”中，宋庆龄所钟爱的音乐成了“资产阶级的玩意”，连贝多芬也被禁，因为他的作品“在思想上有腐蚀作用”。直到1976年4月，在她的书信中才再次提到了那些她喜爱的音乐。她写信给美国友人，请他为自己购买一些国内已买不到的唱片：“如果我们能听一些胜利公司的老唱片，那就太好了。约翰·施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或者是珍妮·麦唐纳唱的《当我们年轻快乐的时候》。简·基斯普里唱的《今晚告诉我》以及舞蹈音乐《耶兰达》，还有法国歌曲《我等着》。”

更让宋庆龄高兴的是，到了1979年，除了在家里欣赏唱片之外，她还有机会到现场聆听交响乐团的演奏。

1979年的3月17日，宋庆龄与邓小平一起在北京红塔礼堂欣赏了由小泽征尔指挥的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演出休息时，宋庆

龄还与邓小平一起会见了乐团团长小泽征尔等人，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演出结束后，宋庆龄又与邓小平一起走上舞台，同小泽征尔以及美国音乐演奏家们亲切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1979年3月17日，宋庆龄与邓小平出席观看由小泽征尔指挥的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北京的首场演出。

这一年的6月，宋庆龄还到红塔礼堂欣赏了享有国际盛誉的美国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的演奏。在幕间休息时，宋庆龄亲自接见了斯特恩和斯特恩夫人及其子女、青年钢琴家戈卢布等人，并向他们表示祝贺，宋庆龄说：“我们很欣赏你的演奏”。宋庆龄还特别赞赏了这位音乐大师对中国年轻小提琴手的提携和培养。后来，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多么希望你能听艾萨克·斯特恩的小提琴演奏啊！我非常喜欢他的演奏。我希望我国不仅能有更多的现代化，而且还能

培养出更多的音乐家！”

在宋庆龄看来，音乐是人类跨越国界的语言，在寓所会见朋友时，她常常会选择自己心爱的唱片，与朋友们一起欣赏，共叙友情。她还常常把唱片作为礼物赠给各国友人。1956年5月6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举行茶会，招待来自27个国家的妇女朋友，她特别邀请了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的管弦乐队为贵宾们表演精彩节目。表演结束后，宋庆龄说：“音乐是我们共同的语言，我希望你们能欣赏并记住这些为我们中国孩子所喜爱的音乐。当你们回国以后，把它带给你们的孩子。愿所有的孩子在以后的年代里，生长在友谊与和平之中。”

宋庆龄曾说过：“要用优美的音乐陶冶孩子们的情操。”她不仅亲自创办了儿童艺术剧院，还时常邀请剧团的小演奏家们到寓所做客。宋庆龄精心挑选了一些西方古典音乐让孩子们仔细聆听，还对他们说：



宋庆龄和上海儿童艺术剧院管弦乐队的队员们一起看乐谱。

“音乐可以陶冶人们的性情、精神、情操，你们搞音乐的要好好学习啊！”

2003年，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从馆藏的宋庆龄唱片中精选出7首宋庆龄最为喜爱的曲目，翻录制作成《宋庆龄珍藏唱片——古典音乐篇》。如今，每当这些音乐响起，人们都会更加怀念那位20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



1979年6月22日，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举行访华首场演出，宋庆龄祝贺斯特恩演出成功。

2. 宋庆龄的电影情缘

1917年2月，宋庆龄曾在给自己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要是自己有钱，很愿意同你们合伙经营电影业，因为这是一种伟大的教育工具。”许多年之后，她最终没能完成自己的这个心愿，但是，对电影的热爱却伴随了宋庆龄一生，直到晚年，孤独的她仍一遍又一遍观看那些她钟爱的电影。

1907年，宋庆龄被父亲送到美国求学，她在美国的六年也正是美国电影业开始飞速发展的年代。虽然没有史料记载那时在美国留学的宋庆龄是否去五分钱剧院看过电影，但是，热衷于新鲜事物的她一定在那时已经知道了电影这种全新的艺术形式。

大学毕业后，宋庆龄来到日本，与家人一起帮助孙中山开展革命工作，也就在那时，宋庆龄结识了孙中山的挚友梅屋庄吉和他的夫人德子。梅屋庄吉是日本电影界的领军人物，他的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夫妇。

“M 百代商会”即是后来日本著名的影业公司“日活株式会社”的前身。1913 年孙中山抵达日本后，梅屋庄吉曾专门为孙中山一个人放映了他珍藏的辛亥革命电影影像，他还将这盘珍贵的胶片赠给了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一家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时常往来，还与德子结为异姓姐妹，上文提到的那封信正是宋庆龄写给德子的。那时，梅屋庄吉创办了“M 香椎商会”，致力于电影业，也许是受到他们的影响，宋庆龄对电影的兴趣越发浓厚。

1918 年 6 月到 1920 年底，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寓所度过了一段短暂而温馨的家庭生活，他们的日常娱乐中有一项就是在家看电影。从那之后，看电影的爱好几乎伴随了宋庆龄一生。



杨杏佛与杨小佛。

宋庆龄的好友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曾回忆说，宋庆龄对自己特别关爱，经常在星期假日约他到家里吃饭，询问学习情况，有时还带他到上海大戏院去看电影，他们看过的电影有《夏伯阳》《生活之路》和《梅蕙丝西行记》等。让杨小佛非常惊讶的是，宋庆龄对影星非常熟悉，这让他们之间多了很多共同语言。

那时，宋庆龄常常参加苏联举办的“电影招待会”，观看了许多苏联的电影，这也让她对苏联的

社会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次，宋庆龄出席上海苏联领事馆为庆祝十月革命 18 周年而举办的招待会，并与鲁迅、茅盾、何香凝、黎烈文、郑振铎、史沫特莱等人一起观看了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结束后，苏联大使勃加莫洛夫面询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宋庆龄深以为然。

其实在宋庆龄看来，娱乐只是电影的功能之一，它更是“一种伟大的教育工具”，而在抗战年代，电影则成为宣传抗战、募集资金的工具。在抗战年代，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就常常与电影界人士精诚合作。

1938 年，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向全世界募集资金、物资援助抗战前线。“保盟”成立后不久，就团结了一大批电影制片人和演员支持“保盟”的工作。1940 年，“保盟”与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合作，在英皇戏院放映电影《裘莱士》，裘莱士是 19 世纪领导墨西哥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一位战士。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放映收入将捐给我们所支持的国际和平医院。我们希望能有很多人去看这场电影。这除了可以帮助一个有益的事业而外，这部影片对我们的事业还能够产生很好的宣传作用，因为片子所反映的当时的墨西哥情况同我们现在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次影片义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两次义演共收入 3000 余元，全部被用于支援国际和平医院。

1941 年，“保盟”又在香港的一家剧院举行反法西斯影片《牧师礼堂》（又译《德国集中营》）的首映式。在宋庆龄号召下，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以及英国和中国的许多知名人士悉数到场观看，此次义演净收入 3217.30 港元，开支仅 60 元，最后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救济中国的战灾儿童。

在那个时期，宋庆龄还与世界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结识。1938 年，伊文思来到中国，希望通过拍摄一部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纪录片，向全世界宣传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及其伟大



伊文思镜头中的宋庆龄和何香凝。

意义。伊文思到达香港后，宋庆龄亲自接见了，并告诉他：“蒋介石只期望消灭共产党，抗日不过是他的第二战线，而且他却要你相信他的谎言。”宋庆龄还向他提出建议：在中国拍电影必须与蒋介石和他的官员们周旋，伊文思将这些忠告铭记在心。后来伊文思拍摄纪录片时果然历经艰险，不仅拍摄期间受到严密监视，拍摄之后还要受到严格审查。宋美龄甚至警告他：“中国仅有在总统领导下的一支军队。您在您的作品中不得宣传任何特别部队，而要突出国军。”尽管如此，伊文思还是以高度的敬业精神拍摄了大量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画面。1939年，伊文思根据这些素材，编辑成著名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并由美国电影明星弗雷德里克·玛尔契解说。这部影片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放映时广受欢迎，在这部影片中，还留下了宋庆龄在香港

接受采访时的珍贵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宋庆龄对伊文思的作品非常欣赏，1979年夏末，司徒慧敏请宋庆龄为中国电影资料馆编印的《尤里斯·伊文思五十年电影回顾》一书题词，宋庆龄欣然接受。当时由于身体不太好，题词分了几次又分几段才写成，宋庆龄特意写了两三份，以备选用。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援助解放区、救济贫苦大众。1946年6月，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义映电影《从军记》，并将收入作为赈灾基金。宋庆龄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本月份，我们举办了6场‘平剧’（即京剧）义演和一部轻松片《从军记》的首映式，收入1.2亿国币。我们打算在灾区设立种子库和肥料厂，以减轻灾情。”此后，电影义演成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募集资金的重要方式。

为了争取电影界对救济福利事业的支持，宋庆龄常常亲自出面“公关”。1948年3月，宋庆龄亲自致信演员约翰·加菲尔德，请他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用他主演的这部电影来为贫苦儿童募集资金。与此同时，宋庆龄还致信新加坡米高



宋庆龄为《尤里斯·伊文思五十年电影回顾》一书题词。

梅东方文化公司的奥康诺，她写道：“我们想要做的事是：在上海和中国为《灵与肉》举行首映仪式。我们在过去做过这样的事，并且取得非常满意的效果。假使你们同意向我们提供这部影片，我们能找到一家上海首轮影院在首映式之夜免费为我们放映。此外，我们都能获得很有价值的公开宣传效益，对各方面——贫苦儿童、你的组织和中国福利基金会都有好处。”

这一年的12月，宋庆龄又从米高梅公司争取到了电影《乱世孤雏》的放映权，这部电影讲述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德国占领区的儿童工作，十分贴合宋庆龄筹款救济贫苦儿童的目的。这次放映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售门票，而是向社会各界发出请帖，观众凭请帖入场，在场内接受捐款。12月22日，宋庆龄亲自主持了影片义映的首映式，义映共募得7万多元金圆券。



宋庆龄看望识字班的孩子们并指导他们读书。



宋庆龄经常在上海寓所的客厅里放映电影，将沙发后的墙壁作为银幕。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宋庆龄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非常忙碌，好友寄给她的电影杂志都无暇细看，只能浏览一下图片。为了不让自己的文化生活太过贫乏，宋庆龄写信邀请好友王安娜一起去看电影，她写道：“眼下正在上映一系列的苏联电影。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去看过一场，虽然我很想看几部。当然，除了《列宁的生活》和《易北河会师》外，一定要看《俄罗斯问题》。”

也许是了解到宋庆龄对电影的喜好，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在1950年5月专门致函宋庆龄，告诉她，如果希望看电影，可在影院为宋庆龄专场播映，也可在宋庆龄的寓所播放。为了不给别人增添麻烦，宋庆龄接受了陈毅的建议，此后基本都是在家里看电影。

那时，上海淮海中路寓所的客厅和餐厅常常被作为放映厅：客厅东面的墙壁作为银幕，放映机则摆在餐厅里。每到节日，宋庆龄都会邀请亲朋好友或是工作人员带着自己的子女到寓所来看电影。宋庆龄常常会举办一种她自己称之为“电影马拉松”的活动——连续观看三到四部电影，这意味着连续坐在银幕前6、7个小时！让宋庆龄的友人十分惊讶的是，往往看到最后，每个人都哈欠连天，而宋庆龄竟然毫无倦容，依然兴致勃勃。在一次“电影马拉松”之后，路易·艾黎写信给宋庆龄赞叹道：“你不仅有钢铁束腰（医生要求的），你还有钢铁的意志！”

宋庆龄看电影时全神贯注，有时甚至让她忘了周边环境。1975年，北京经历了一次4级的地震，而当时宋庆龄正在家里看电影，竟然全无感觉。事后，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谈起了这件事：“我们8号的时候是经历了4级震动，幸运的是我们那时在我家看电影，非常投入，有趣的、优美的音乐伴随着故事情节，我们都没有感到害怕，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地震！”

宋庆龄看过的电影很多，美国、苏联和日本的影片她都很喜爱看，而她最为偏爱的电影有《大独裁者》《翠堤春晓》《音乐之声》《心儿在歌唱》等。尤其是《音乐之声》，宋庆龄对这部影片和影片中的音乐都非常喜欢，常常用这部电影来“招待”年轻客人。

不过，宋庆龄也曾遇到过尴尬的事情，70年代末，影片进口放松了，进来了不少外国乌七八糟的东西。一次，在她家里放映的一部影片使她非常恼火，她在给友人的信中抱怨道：“这部片子……实在太坏了……叫什么‘纽约、巴黎及东京之夜’……那种不象话的脱衣舞之类的玩意。……我真懊丧得要命，居然在我家里放这种东西给（两位客人）看。”

3. 宋庆龄与电影事业

宋庆龄不仅自己爱看电影，还十分支持新中国的电影事业。

1959年，著名导演金山将话剧《红色风暴》改编为电影《风暴》，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片。在影片中，有一个场景是军阀吴佩孚接待罢工代表林祥谦等人，在拍摄这个场景时，导演金山的要求极其苛刻，要求布景在最大程度接近历史真实。为此，道具组长张先春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最后却发现，吴佩孚当时的沙发在建国时被放在了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

这下张先春为难了：为了一部影片的道具，去打搅国家副主席合适吗？最后，他硬着头皮到厂里开了介绍信，准备去宋庆龄的家里借沙发。然而，当他真的来到了宋庆龄的寓所，心里又开始七上八下起来：宋副主席能答应吗？让张先春没想到的是，一切竟出乎意料的顺利。当时宋庆龄虽然不在家，但经过电话请示，她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将沙发借给了剧组。

沙发的问题解决了，没想到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影片中有一幕英国大使馆的场景，需要用到吊灯，但是那时拍摄周期很紧，订做根本来不及，难题又一次摆到了张先春的面前。他突然想到，上次到宋庆龄家里借沙发时，看到有几个漂亮的大吊灯，恰好符合布景的要求。但这一次动静就更大了，因为借吊灯要从屋顶拆下来才能搬走，用好后还要再装回去，这让张先春在为难的同时又深感不安。但为了艺术效果，他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拿着介绍信再次来到了宋庆龄的家里，没想到这次和上次一样，宋庆龄又是十分痛快地答应了。

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风暴》终于如期拍摄完成。不过这件事后来让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对摄制组进行了严厉地批评：“谁让你们去惊动宋庆龄副主席的！”尽管如此，摄制组的同志都对宋庆

龄充满了敬意。平时拍戏时，为了解决场景的问题，他们经常和一些居民商量到他们的家里去拍戏，虽然是有偿的，但多数会遭到拒绝，但作为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却如此慷慨无私，全力支持，这不能不使人感动。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小花》，这在当时是一部“横空出世”的影片。剧本中有一个表现反面角色的特写镜头：在桌前看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然而剧组却在拍摄时遇到了困难：这是一部禁书，资料室没有，书店里也买不到。后来，张先春想到北京图书馆一定有，但北图却表示这是禁书，不能外借，这下剧组陷入了困境。后来大家集思广益，想到了一个人，宋庆龄的警卫秘书隋学芳的女儿隋永清，她正在《小花》剧组演戏，让她拿着宋庆龄的借书证不就能借出来了吗？隋永清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宋庆龄，没想到宋庆龄明



隋永清（左三）与宋庆龄。

确表示反对：“那是一本很坏的书，你们借它做什么用？”隋永清向宋庆龄讲明原委后，宋庆龄这才表示同意，但她把借书证交给隋永清时，仍不放心地叮嘱道：“你可以给摄制组去借，但我现在必须讲明，谁也不能看。你首先不能看。借来后直接拿到摄制组。从头至尾要由你保管，不能转手他人。拍完，立刻还到北图去……”

后来，隋永清顺利地借到了这本书，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这个镜头终于得以拍摄成功。

除了为拍摄电影提供帮助，宋庆龄还曾亲自指导演员扮演自己。

肖惠芳是一位话剧表演艺术家，她曾在电影《陈赓蒙难》《开国大典》中多次扮演宋庆龄，1978年，她在话剧《大江东去》中首次扮演宋庆龄，为了演好宋庆龄，剧组决定请宋庆龄亲自审定剧本和演员的化妆造型。

这天，肖惠芳在秘书的带领下来到了宋庆龄的面前，宋庆龄微笑着对她说：“你先走给我看看。”看到肖惠芳有些紧张，宋庆龄耐心地教导她：“胸脯再挺一挺，头再抬一抬。”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宋庆龄并不是走个过场，她细心地摸了摸肖惠芳的头发，告诉她发髻要紧一点，不要翘起来，接着她还招呼化妆师：“你来，你看看我的头是怎么梳的，摸摸看。”接着，她亲昵地将手搭在肖惠芳的肩上，笑着说：“你可不要烫头发，我一辈子都不喜欢烫头发。”过了一会，她又突然想起什么，叮嘱肖惠芳：“我是喜欢这样坐着的。”然后又指着脚说：“有时喜欢左脚在前面，有时喜欢右脚在前面，我一辈子都喜欢这样坐。”看到宋庆龄如此和蔼可亲，大家都都放松了下来，有人就问宋庆龄：“你生气的时候有些什么特点？”听到这个问题，宋庆龄笑得前仰后合，然后加重语气说：“我要生什么人的气，就这样对他说：‘你一定要改！’”只见宋庆龄认真表演起“自己”，她脸色严肃，双眼炯炯有神，右手的食指伸出，指着想象中的“对方”……

后来，肖惠芳的演出非常成功，她还接到了宋庆龄秘书打来的电



宋庆龄在上海寓所留影。

话：“首长昨晚看了电视转播，她很高兴，……她说你演得有些像呵。”

直到晚年，宋庆龄仍然关心着中国的电影事业。一次，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前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便问他，现在电影界看不看外国电影，能不能看到好的外国片子？司徒慧敏向宋庆龄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宋庆龄语重心长地说：要向别人借鉴，能看到好的当然很好，可以学习；即使是不好的也可以分析它的不好之处，防范我们向不好的东西抄袭。在宋庆龄去世前半年，她还对第三届电影“百花奖”的评奖活动十分关注，向司徒慧敏询问情况。司徒慧敏便问她是不是所有得奖影片都看过了，宋庆龄说，她只看过少数一两部，没有全看，但认为中国电影进步很快、很好，形式和内容都较新颖。在授奖活动过程中，她特意派人送来了祝辞，并在祝辞上写道：“热烈祝贺中国影坛百花盛开。”

其实宋庆龄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中国能拍摄一部关于孙中山的电影。

早在1930年，梅屋庄吉就曾计划拍摄一部鸿篇巨制《大孙文》，计划中，这部电影将长达5个小时，演职人员将超过3000人，梅屋庄吉对影片的费用进行了详细的预算，达到3.2亿日元。然而，随着中日关系的迅速恶化，这部电影迟迟不能开机，最后终于夭折。

1946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致函宋庆龄，请求她同意由自己创作一个孙中山的电影剧本：“剧本将用广泛的人性的观点描述孙逸仙博士革命的一生对中国人民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我想让你知道我会怀着对孙博士及其革命的一生极其崇敬和钦佩的态度来完成这个任务的。我想让我国人民真正地、深深地了解他、深深地敬仰他，就像敬仰我们的林肯一样。”宋庆龄回信告诉她，中国内战尚未停息，还需要等待机会。

十年后，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宋庆龄经过认真考虑，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拍摄一部关于孙中山的电影。她写道：“中山先生的坚毅无私的革命精神构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动人的事迹。我个人的想法是：可以把这种事迹编成一个故事作为国内外的宣传。我建议用这个题目编制一部电影，挑选最优秀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等来进行这项工作，使这部电影有吸引力而对教育青年和建设社会主义发挥其积极性。”

宋庆龄还随信附上了赛珍珠十年前的来函，由此可见，虽然当年宋庆龄并未答应赛珍珠的请求，但她其实一直在考虑此事。遗憾的是，宋庆龄生前并没有机会看到一部真正的关于孙中山的电影。直到1986年，在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之际，海峡两岸同时拍摄了三部关于孙中山的电影《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和《国父传》，宋庆龄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而此时，离宋庆龄去世已经过去了5年。

4. 宋庆龄的书画情缘

上海宋庆龄故居的过道厅里，陈列着一幅徐悲鸿画赠宋庆龄的“双马垂柳图”，上款“孙宋庆龄夫人惠教”，下款“卅四年夏日悲鸿写”，这是徐悲鸿于1945年夏在重庆画赠宋庆龄的。关于这幅画，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那是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重庆，一天，徐悲鸿来看望宋庆龄，特地带来了一幅画。宋庆龄打开一看，画中有两匹骏马，其中一匹在低首觅食，而另一匹则背向观众，正竖耳警觉地凝视着远方，正好马屁股对着人。宋庆龄笑着说：“徐先生，怎么马屁股对着我啊？”徐悲鸿也笑了，马上说：“我再画一张送给你。”不久，徐悲鸿又重



徐悲鸿画赠宋庆龄的《双马垂柳图》。



宋庆龄在《奔马图》前留影。

新画了一幅奔腾的骏马送来，宋庆龄很是高兴。有趣的是，那幅徐悲鸿后画的奔马图后来被宋庆龄赠给了友人，而那幅“马屁股对着人”的双马图却一直留在了宋庆龄上海寓所的过道厅中。

其实说“马屁股对着人”是宋庆龄在和徐悲鸿开玩笑，宋庆龄一生热爱艺术，尤其对书画情有独钟，她在上海寓所留下的遗物中，既有徐悲鸿、齐白石等大家的名作，也有何香凝、杨杏佛等好友的手迹，更不乏各国友人赠给她的各类名画佳作。宋庆龄本人也与徐悲鸿、丁聪、陈树人、傅叔达等画家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在战乱年代，还时常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宋庆龄对书画有着独到的鉴赏力，在寓所每个房间，宋庆龄都精心挑选布置着她喜爱的画作。有油画、水彩画、素描、国画，虽然画的风格、内容各不相同，但是经过宋庆龄的精心布局，显得十分协调，相得益彰。在会见客人的过道厅和客厅，宋庆龄布置着通透凝重的苏联风景油画；在餐厅，则是极具民族特色的缅甸风俗画和印度水彩画；在卧室，宋庆龄悬挂着几幅古朴典雅的日本版画；而在每天工作时间



1939年宋庆龄在香港参观爱国抗日画展，与画家丁聪、陈烟桥合影。

最长的办公室，宋庆龄选择陪伴自己的则是丈夫孙中山的素描像。

宋庆龄收藏的名家画作很多，但她始终有着自己的喜好和偏爱。陈树人并非画坛巨擘，他与宋庆龄结识于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两人志同道合，常有书信往来。对陈树人的画，宋庆龄非常欣赏，还曾专门建议国家美术馆收藏他的画作。黛丝·雅丝巴是苏中友好协会成员，本来与宋庆龄并不相识，后来她将一幅孙中山的素描像赠给宋庆龄。宋庆龄对这幅素描非常喜欢，便将其挂在了自己办公室的壁炉上方。

在宋庆龄的书画收藏中，木刻版画也占据着一席之地。20世纪30年代，鲁迅积极倡导新兴木刻，宋庆龄作为鲁迅的好友，对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也是积极支持。1934年，宋庆龄和鲁迅一起挑选了55幅中国木刻和绘画作品交给法国一杂志的女记者琦达·谭丽德带去法国展览，这个名为“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后来又移至莫斯科展出，宣传了中国新兴的木刻艺术。



黛丝·雅丝巴所作的孙中山素描像。

1946年9月18日，“全国木刻协会”在上海大新公司画廊举办“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这个展览得到了宋庆龄和郭沫若等十余位著名人士的热情赞助，展出的作品的作者一半来自解放区，一半来自国统区。展览结束后，又赴英国、比利时、日本等地展出。之后，宋庆龄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还通过廖梦醒向全国木刻协会征集木刻作品，



送往美国和加拿大展览。这些木刻版画的国际活动，扩大了中国木刻在世界艺术领域里的影响，也使更多的国家从作品中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

不仅如此，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还通过“文化福利基金”救助生活困难的木刻家。许多青年木刻家将自己的得意之作赠给宋庆龄，表达对她的敬意。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著名的版画大师，而宋庆龄收藏的这些版画，后来也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

在宋庆龄的版画收藏中，有一本鲁迅签名题赠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宋庆龄收藏的版画。

珂勒惠支是一位德国版画家，她是现代美术史上最早以自己的作品反映工人的痛苦生活和英勇斗争的革命版画家之一。1936年，鲁迅编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宣传珂勒惠支的革命精神，鼓励木刻青年加强思想改造和创作锻炼，重视自己作品的艺术语言和思想力量。后来，几乎所有的进步木刻青年都受到过珂勒惠支作品的良好影响。宋庆龄所收藏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就是鲁迅赠送国内友人的40本中的1本，封面上还留下了鲁迅的亲笔签名。



宋庆龄与高醇芳。

宋庆龄不仅自己喜爱书画、收藏书画，她还常常鼓励并帮助身边后辈学习中国传统书画，旅法女画家高醇芳便是其中一位。高醇芳的父母早年与宋庆龄相识，她自幼学习中国传统书画，由于习画的需要，高醇芳很想多看一些中国的传统书画，这对身居海外的她来说比较困难，于是，宋庆龄便亲自帮她收集。画册上的，杂志内页上的，贺年片上的，甚至邮票上的，只要是书画，宋庆龄都一一收起来，随信

寄给高醇芳，她还十分贴心地建议高醇芳把自己的画也印制成贺年片，以扩大影响力。宋庆龄的鼓励和关爱成为高醇芳进步的动力，无形中增加了她对自己绘画技法的信心，也更坚定了她用画笔来弘扬中华文化的决心。

宋庆龄晚年还曾自学绘画，陶冶性情。有时宋庆龄会拿起画笔，画上一只毛茸茸的小鸡，或是一羽可爱的白鸽，栩栩如生；有时她还会用自己绘制的花卉做成精美贺卡赠给朋友们，表达自己的思念和深深祝福。

有时，宋庆龄的画作中也会有深深的寓意。1972年的一天，宋庆龄画了一只昂首阔步、雄赳赳的大公鸡，赠给了秘书张珏。张珏当时并没有想到大公鸡有何含义，她问保姆钟兴宝，钟兴宝只是告诉她：“是夫人画给你的。夫人说，没有样子，凭想象画的，几分钟就画成了。”直到许多年后，张珏才想起，公鸡是报晓的，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宋庆龄画这只昂首挺立的雄鸡，正是寓意破晓鸡啼，天快亮了。

如今，斯人已去，书画仍在。那些宋庆龄精心收藏的画作和她自己绘制的小品，仍在向人们诉说着宋庆龄对书画、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美的不懈追求。



宋庆龄画的小鸡。

5. 宋庆龄养猫

宋庆龄喜爱小动物，尤其喜爱猫。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在重庆期间，宋庆龄就曾在寓所养过猫，宋庆龄对它非常疼爱，一次，猫咪生病了，宋庆龄非常紧张，她连忙联系友人王安娜，请她用车带着保姆去给猫咪看病，宋庆龄焦急地说：“它两次从二层楼上跳下来，似乎病得不轻，整夜气喘和腹泻。我感觉如不去看医生，它会死的。”

在宋庆龄的上海寓所，曾养过四只猫，其中有一只名叫“彼得金”的猫是宋庆龄最喜爱的。



宋庆龄在上海寓所花园留影。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一天清晨，秘书张珏从家来到宋庆龄寓所，一进大门，冷不防蹿出一只猫来，身体黑白相间、毛色油亮、尾巴乌黑，样子逗人喜爱，保姆李燕娥跟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呼唤着“彼得金”。时间长了，张珏才知道，这只就是宋庆龄和李燕娥最宠爱的猫。

宋庆龄爱清洁，“彼得金”也爱清洁，它从不随地大小便，总是在小扶梯旁的指定地点方便。它平时爱吃小猫鱼

伴米饭，从不偷食家里的东西，晚上还会充当“警卫员”，为家里捕捉老鼠。“彼得金”善解人意，很有灵性，逢到家里熟悉的人，就会伸出右爪和你握握手，宋庆龄示意要扇子、拖鞋，它也会立即用口衔来给她。为此，宋庆龄和李燕娥特别喜欢它，产生了特殊的好感。宋庆龄在家时，人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咪唔咪唔叫个不停。宋庆龄在办公时，它蜷伏在脚旁不吵不闹、一动也不动。宋庆龄在起居室坐在沙发椅上休息，它就躺在沙发旁，闭着眼睛睡觉。宋庆龄在餐厅用膳时，它坐在大餐台（即餐厅餐桌）下等待着宋庆龄给它的美食，津津有味地吃着，还不时伸出舌头在嘴边舔个不停。午膳后，按照惯例，宋庆龄到大阳台上回来踱步，它也要跟着走。宋庆龄坐在藤椅上晒太阳，它亦仰卧在地，不断翻身晒太阳，高兴时纵身一跳坐在宋庆龄膝盖上摇头摆尾，伸出前爪，要和宋庆龄“把手言欢”，真是好玩极了。每当宋庆龄外出归来，只要汽车开到大门口，按三声喇叭，它就会从楼上飞快地跳到楼下大扶梯旁，迎接主人的归来。

一年一年过去，“彼得金”



宋庆龄和她饲养的猫。



宋庆龄在上海寓所留影。

在不知不觉中逐年衰老，不幸死亡，根据宋庆龄和李燕娥的意见，工作人员把它深埋在前花园东侧的竹林中。

宋庆龄还曾养过一对波斯猫“珍妮”和“汤咪”，两只波斯猫外表都很漂亮，一身洁白的长毛，长着一对碧绿似翡翠的大眼睛，可惜的是它们不争气，一到宋庆龄寓所，就到处大小便，弄得家里臭烘烘，几经训练，也改不了，而且这两只名种猫竟然不会捉老鼠。最后，宋庆龄只好无奈地嘱咐周和康物归原主，送回了西郊公园。

十年浩劫中，一只黄色虎狸斑的小猫失去了主人，流落到了宋庆龄的寓所，它自己从大门钻了进来，像是知道这里可以避难一样。那时宋庆龄不在上海，寓所工作人员看到它可怜就收留了它，而它也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宋庆龄回沪后，看到这只娇小伶俐、活泼可爱的猫十分喜爱，还亲自为它起名“来宾”——不请自来的宾客，这也

是宋庆龄养的最后一只猫。那时宋庆龄经常住在北京，她写信回家时总不忘问问“来宾”的近况。“来宾”性情活泼，不仅为寓所捉老鼠，还常常越过围墙出去玩耍，玩得饿了，才回来吃饭。1979年冬天，它像往常一样出去玩耍，不知为什么，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宋庆龄和她饲养的猫。

6. 宋庆龄养鸽子

众所周知，宋庆龄喜爱鸽子。与孙中山居住在莫利爱路寓所期间，宋庆龄就曾养过鸽子。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在京沪两地的寓所都养着鸽子。据说一开始，是有两只迷路的鸽子落到了北京方巾巷宋庆龄住宅的屋顶上，工作人员便收养了它们。几天后，宋庆龄从上海返回北京，工作人员向她报告了这件事，并请示她如何处理，宋庆龄高兴地让他们建起鸽舍，把鸽子饲养起来。从这以后，宋庆龄养的鸽子一天比一天多，其中有从市场上买来的，也有国内外友人赠送的。后来宋庆龄迁居到后海北沿46号，命人专门在北山前建起一个大鸽舍，饲养了近百羽鸽子，而



宋庆龄亲自喂养鸽子。



宋庆龄与她饲养的鸽子。

她在上海的寓所，也养着几十羽鸽子。

每到空闲时，宋庆龄就端着一个小筐筲，用面包屑和绿豆掺和自做的鸽食，亲自来给鸽子喂食。听到她吹的口哨，鸽子就会应声飞来，落在她的周围，甚至她的肩上。有几只调皮的鸽子，甚至直接从女主人的手里啄食。这是宋庆龄最开心的时候，身边人也知道宋庆龄的爱好，曾为她拍下了一组喂食鸽子的照片，成为珍贵的记录。

宋庆龄最爱的是一只名为“Gothe”（戈西）的鸽子，它有一身深浅咖啡相间的羽毛，颈部则是雪白，非常漂亮。每天清晨，宋庆龄轻步下楼，走出楼层西门，在鸽棚前止步，轻声呼唤着“Gothe”，戈西立刻就会从鸽棚里飞出，迎着宋庆龄跳跃着，扑棱着翅膀。伴随着戈西，其他鸽子也会闻声飞到她的跟前。这时，“哗”地一声，宋庆龄撒下一罐鸽食，然后饶有兴趣地欣赏戈西和其他鸽子们有滋有味地跳跃啄食。后来戈西因衰老而死去，宋庆龄特意嘱咐工作人员拔下一根羽毛，插入笔筒放在案头，作为永久的纪念。还有一只特别漂亮的观赏鸽，头颈部和前胸都生着紫色的羽毛，宋庆龄也十分珍爱。鸽子老死后，宋庆龄非常伤心，亲自到院子里埋葬了这只鸽子。此后，宋庆龄在招呼鸽子的时候，还经常叫着这只鸽子的名字，而鸽子们也会一齐飞来，安慰它们的主人。

除了这两只，对其他鸽子宋庆龄也是十分喜爱。一次，宋庆龄打算到上海长住一段时间，就特意从北京的寓所挑选了好几羽鸽子带到上海自己喂养，不然便放心不下。每到寒冬来临，宋庆龄会询问鸽棚铺好稻草没有；春回大地，宋庆龄又会关心鸽棚的安全防备，有没有被乌鸦“侵略”。一次，一只刚孵出来的幼鸽被乌鸦从鸽棚顶盖飞入叼走了，宋庆龄非常生气，工作人员就发起了一场打乌鸦，保护鸽子的“战斗”，最后终于捉住了罪魁祸首，解了大伙的心头之恨。从此，鸽棚又恢复了平静而温馨的生活。

十年浩劫，宋庆龄的鸽子也险些遭难。“文革”初期，一天，宋



Dear Agnes -
So you see I still
want to live on a
farm! SCS

宋庆龄送给廖梦醒的照片。背面写着：“你瞧，我仍然想住在农场！”

庆龄写信给李燕娥和周和康，告诉他们：“这里（北京）的红卫兵天天各处去斗争，破四旧，立四新。居民家里有封建或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要丢掉……以后不许养狗养猫等，家里的鸽子是否可能继续保养，因伤粮食之故，请你们研究。”不久后，周和康又收到宋庆龄的一封信：“周同志，请你把家里养的鸽子，拣10只最好的送去给陈丕显同志，另送6只给沈粹缜大姐，其余留下来的，全部杀光。据说养鸽子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周和康遵照宋庆龄的指示，将鸽子分送给陈丕显和沈粹缜后，实在不忍心将余下的鸽子杀掉，便与李燕娥商量，回了一封信给宋庆龄：“鸽子是和平的象征，您曾把一对象征和平的白鸽，赠送给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十分高兴地收下了这一珍贵



宋庆龄将自己养的一对白鸽赠送给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的礼物。鸽子也是通讯的小天使，您外出时，带上几对上海家里的鸽子，在北京放飞，千里迢迢，翱翔蓝天，飞回上海的家里，停在鸽棚上，咕咕叫着，似乎在告诉我们，它们已完成光荣的使命，自由自在地胜利而归了。为此，恳请首长考虑，同意我们把多余的鸽子留下，让它们自由飞翔在蓝天，让它们永远在您身边啄食……”后来，宋庆龄很快写了回信，同意把其余的鸽子继续留养在家中。

谁知没过多久，北京的鸽子又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69年8月，宋庆龄就在报上看到了一篇名为《养鸽、养鱼，玩物丧志》的报道，无奈之下，请北京寓所的工作人员把一部分鸽子送给何香凝，余下的全部让伙房杀掉。工作人员知道，这其实并非宋庆龄的本意，便没有按照宋庆龄的指示杀掉鸽子，而是向周总理报告了此事。后来，在大家的要求下，秘书张珏给宋庆龄写了一张便条，她写道：“您说过鸽子象征和平，让它们在蓝天飞翔吧！让它们在您身边啄食吧！”最后，这些鸽子也终于得以保留下来。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宋庆龄饲养的这些鸽子还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那时，鸽子蛋被认为是高蛋白营养品，宋庆龄得知周恩来身体不好，多次命人给周恩来送去从自己的鸽棚里收集的鸽蛋。后来，宋庆龄还经常把鸽蛋作为营养品送给邓颖超、罗叔章、康克清。1975年7月，得知罗叔章生病，宋庆龄专门送去了16只鸽蛋，并附上一封短信：“这里有新鲜鸽蛋16只请你天天吃，炒或汤内吃，都有益与（于）身体。”

宋庆龄喜爱鸽子，对鸽子的形象，她也有特殊的偏爱。1952年，宋庆龄发起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她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这次会议的文件夹、代表证和会场上，都用了毕加索的画作“和平鸽”作为会议的标志。宋庆龄非常喜爱这个鸽子形象，把印有“和平鸽”图案的文件夹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用了很长时间。在北京宋庆龄故居，还珍藏着一枚宋庆龄用过的鸽子图案的胸针。

宋庆龄喜欢鸽子，不仅因为它们文雅、温顺而执着，更因为它们象征着和平。而和平，是宋庆龄毕生的追求！



宋庆龄在北京寓所和孩子们一起看鸽子。

7. 宋庆龄与花

宋庆龄爱花。

在宋庆龄上海寓所的花园里，种植了许多她喜爱的花卉和树木。花园四周环绕着三十余棵高大挺拔、终年葱茏苍翠的香樟树。主楼前，则种着几棵桂花树，夏不畏暑，冬不畏寒，繁叶满树，每年中秋前后，花事叠叠，香飘四方。还有一排爬藤蔷薇，攀援直上二楼阳台，枝叶茂盛，春秋季节，花开喷香，鲜红的、鹅黄的、粉红的，繁花似锦，连成一片，逗人喜爱。朝南的大阳台上，摆着几盆朱德委员长亲自赠送的兰花，绿叶似箭，花香扑鼻。在通向大阳台的落地门窗前，摆着几盆白兰花和茉莉花，每当洁白的花朵含苞待放时，芳香四溢，令人心旷神怡，宋庆龄就健步走向阳台，自己动手折下几朵，用手帕包好，放在自己胸前的口袋里。

友人们知道宋庆龄爱花，也爱自己种花，常常会送给她一些花卉的种子，宋庆龄则将种花养草视为生活的乐趣。宋庆龄还常常将自己种植的花卉作为礼物赠给朋友们。一次，宋庆龄得知友人王安娜心情沮丧，便去信安慰，还随信附上自己种的郁金香：“我刚才从花园里采了一些郁金香送给你，希望你喜欢。谨表爱心。”1957年，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宴请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宴会以后，伏罗希洛夫兴致勃勃地到屋前走廊里去散步，在景色怡人的花园里，宋庆龄亲自摘了一枝热带兰花，佩在伏罗希洛夫的衣襟上。

宋庆龄对插花艺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宋庆龄的家里，常年布置着四季鲜花和盆景，保姆李燕娥负责插花，她最了解宋庆龄的喜好，常用的花有玫瑰花、香水月季、菖兰、康乃馨、阿丽斯、菊花、象牙红、水仙、腊梅、天竹、银柳等。每当家里接待中外重要来宾时，宋庆龄总是事先作好周密的布置，亲自巡视，调整插瓶花、盆花的布局，



宋庆龄在上海寓所花园留影。

有时还拿起剪刀，亲自修剪一番。1956年10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到访的前一天，宋庆龄亲自视察花卉布置的情况，她对李燕娥和周和康说：“插花是一门很有讲究的艺术，在厅室里，插上一束绚丽多彩的鲜花，可以起到画龙点睛、满室生辉、给人以美的享受作用。周同志，你看，李姐的插瓶花，千姿百态，多有趣呀！你要向她好好学习。”接着又说：“插花要和季节相结合，在元旦，要插象牙红、腊梅和水仙，给人以艳红青翠迎新年的喜庆、祥瑞气氛。春节要插上腊梅、天竹和银柳，这是传统中国式的插花，给人以吉祥如意、凝重幸福的感觉。要使鲜花开得鲜艳饱满而又持久，花瓶里的用水很有讲究。早晨花瓶里加水、换水，可使花朵在较长时间内不枯败。盆花晚上都要搬到室外，放在阳台上，它吃些露水才能长期保养好。”

宋庆龄最喜爱的是一种叫做“安多利恒”的花。1972年1月，日本友人吉幸治拜访宋庆龄时，赠送了两打产自夏威夷的安多利恒花。宋庆龄收到这花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种友谊的象征，她把这些花一部分插进花瓶，放在卧室里。后来，她还曾送了一些给邓颖超、王光美等人。宋庆龄非常注意对这些花的养护，她给邓颖超、王光美写信，专门嘱咐怎么保养它们：晚上要把这些花拿到室外，让它们躺在澡盆里睡觉，承接天上的露水，早上起来再把它插起来。还有怎么修枝，用什么水浸泡，都说得很仔细。不过花期总是有限的，无论怎么精心养护，鲜花终会凋谢。怎样才能让这花常开常艳、永不凋谢呢？于是宋庆龄和她的保姆一起，照着这花做了一个绣品，把它那绚丽多姿的风采永远定格下来。这是宋庆龄一生中，唯一的一个自己刺绣的完整绣品，她把这幅绣品镶在镜框里，始终挂在自己的床头。吉幸治知道宋庆龄喜爱这种花，每年都会给宋庆龄寄来一些，1976年，吉幸治在美国的家中去世，但是寄往中国的安多利恒花并没有中断，他的儿子小有吉幸治，继续着父亲的遗愿，依然每年给宋庆龄寄去吉祥如意的祝福。

宋庆龄虽然爱花，但有时，鲜花也会给宋庆龄带来烦恼。宋庆龄

晚年一直被严重的皮肤病困扰，有时，接触鲜花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可是，每次出访时，作为外交礼仪，热情的主人总会为宋庆龄献上鲜花，宋庆龄明知道自己会因此过敏，却还是坚持微笑着接受鲜花，把最美好的形象留给各国友人。1964年2月26日，宋庆龄与周恩来、陈毅出访锡兰，在机场宋庆龄受到热烈欢迎，孩子们把一圈又一圈的花环挂在宋庆龄的脖子上，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端庄的笑容，亲切地和孩子们握手致意，没有人知道，此时，宋庆龄的皮肤已经开始发痒，这些花已经引起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宋庆龄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科伦坡有许多花，对于像我这样体弱的人会引起过敏反应。在那里的4天里，我的两眼一直是红肿的，……脖子变得越来越粗。”



宋庆龄绘制的花卉。

今天，在上海宋庆龄故居，她所钟爱的花园依然四季鲜花绽放。在每年宋庆龄诞辰和逝世的纪念日，故居都会用“鲜花代门票”的方式来纪念她。游客们则常常在宋庆龄的雕像前献上一束鲜花，缅怀这位伟人。

正如宋庆龄的好友路易·艾黎所说，宋庆龄就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永远给人们以鼓舞。



宋庆龄在上海寓所花园留影。



宋庆龄在上海寓所花园留影。

8. 宋庆龄打康乐球

说起康乐球，不少上年纪的人还有印象，这是一种简单而平民化的运动：用五夹板做一只正方形（也有长方形）的盘，四周用硬木做高约一寸的边，四个角的地方各开一只直径约7厘米的洞，再用硬木做若干只（一般为36只，另加母子一只）形似象棋的子。游戏时四人对抗进行，以击子进洞多少定胜负。

康乐球到底如何起源现在已无从考证，康乐球得名是从英文corner ball的音译而来，意为“角球”。康乐球传入中国大约是在20世纪40年代，不过仅仅在部分沿海地区流行。到了50年代，因为台球房被陆续关闭，作为取代台球的一项运动，康乐球逐渐开始流行起来，甚至一度成了上海市民日常娱乐的主角。宋庆龄就是从那时起也开始热衷于这项运动。

其实宋庆龄打康乐球最初是来自医生的建议，主要是为了让宋庆龄增加一点体育活动。原来宋庆龄的主要活动是跳舞，宋庆龄的舞跳得极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宋庆龄身体灵活性不如以前，腿又有疾病，不能再跳舞了。但是长久不进行活动，对身体更加不好，为了让她增加点活动，医生就建议宋庆龄打康乐球。康乐球活动并不剧烈，但击球时肩臂的肌肉会受到牵引锻炼，长时间锻炼，对肩部和腰部的关节放松有一定作用，对她比较适合。

每天午饭后，只要有时间，宋庆龄她都要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打上几盘康乐球。康乐球要四个人打，两人一边，宋庆龄有时和保健医生力伯畏搭档，有时和服务员搭档，而秘书张珏和警卫秘书就作为她们的对手。宋庆龄十分好胜，总是想方设法取胜，有时还会做些不失天真活泼的“恶作剧”。当轮到张珏打一只很容易命中的棋时，宋庆龄会绕到她的身边，冷不防用棋棍轻轻地敲一下张珏的头。这样一来，



宋庆龄用过的康乐球。

本该打中的棋，不知怎地就偏了方向。这时，宋庆龄会得意地笑起来，让人感到她活泼、俏皮、童心未泯。一旦宋庆龄和服务员赢了，宋庆龄就乐滋滋地拿出从上海带去的心爱礼物——五香豆和糖果来奖励搭档，表现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有时，打得好了，宋庆龄的兴致会越来越高，从早上八九点钟，一直打到傍晚，直到她赢够了才“鸣

金收兵”。

不只是和工作人员打康乐球，宋庆龄还常常邀请自己的好朋友到寓所来“切磋”，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就是其中的一位。沈粹缜的女儿，年过八旬的邹嘉骊老人回忆说：“宋庆龄经常请母亲去她位于淮海中路的寓所玩，有时一起打康乐球。球桌就摆在过道厅的壁炉前，两人一边打球，一边说说笑笑……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她俩是闺蜜。”

宋庆龄虽然看起来性格深沉，温文尔雅，其实兴趣广泛，尤其爱好运动，上大学时，她就是学校网球俱乐部的成员，是最早参与网球运动的中国女性。与孙中山一起生活时，她不仅学会了骑马、游泳、开车，甚至学会了射击。晚年时，她曾告诉秘书：“我的枪法，现在的警卫秘书不及我。”

|| KU KLUX ||



Senior Tennis Club

LEO BAKER	MARIE BARROW
REBECCA BRANHAM	CHRISTINE BRYAN
ETHEL GARDNER	THERESA HODGES
WILLANNE GURR	EMILY MELTON
KATHLEEN McRAE	MINNIE McMICHAEL
ANNIE LOU HARDY	VIRGINIA FRASER
CHUNGLING SOONG	

126

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时参加网球俱乐部活动。

9. 宋庆龄与足球的故事

2013年3月24日下午，英国球星贝克汉姆来到北京宋庆龄故居参观瞻仰。他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宋庆龄生平陈列和故居，向这位20世纪的伟大女性敬献鲜花。参观结束后，贝克汉姆还在故居的草坪上一展球技。这位足球大使可能想象不到，其实，宋庆龄与足球运动也有着一段渊源。

1942年冬至1943年春，久旱后的大暴雨导致黄河决堤，河南省遭受特大水灾，灾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满目疮痍。为赈济河南水灾灾民，宋庆龄决定在重庆发起组织一次国际足球义赛。宋庆龄的倡议得到了各国大使和重庆市长贺耀祖的支持，很快便组成了四支参赛球队，分别是由沪赴渝的全国足球名流组成的“沪星队”，由重庆当地体育人才组成的“东平队”，由英国驻华使馆、军舰等工作人员组



宋庆龄在足球义赛的开幕式上。

成的“英联队”和当时韩国在华青年组成的“韩青队”。比赛门票分为荣誉券和普通券两种，荣誉券又分100元、200元两种，由宋庆龄亲自推销，普通券一律10元，由社会服务处代销。

1943年5月15日，国际足球义赛在川东师范学校广场（现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开幕。宋庆龄在英国大使薛穆爵士陪同下，缓步行至球场中，6000余观众全体起立致敬。宋庆龄与参赛的四支球队的队员们一一握手，以示感谢，并亲自主持开球仪式。虽然此次赛事赛场的布置十分简朴，观众席就是用长木板铺在架子上制成，只有少数贵宾坐折叠椅，而上面也没有遮阳。但是，观众们热情高涨，不仅门票抢购一空，比赛用球以500元拍卖给一位爱国人士，连比赛的全部费用也由某巨商“自愿担负”。最后，沪星队五比二战胜韩青队，而东平队则以六比三完胜英联队。在闭幕式上，宋庆龄将四面锦旗分赠给四支参赛球队，还赠给每位球员一枚刻有“参加筹赈豫灾足球义赛纪念 孙宋庆龄赠”字样的纪念章。此次国际足球义赛共募得125530元，后全部汇交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专门用作赈济豫省灾民。



宋庆龄赠给参加足球义赛运动员的纪念章。

宋庆龄组织的这次国际足球义赛不仅为灾民们雪中送炭，也让战争年代沉寂甚久的足球空气为之一振旗鼓。

说到宋庆龄与足球的故事，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被称为“亚洲球王”的李惠堂。他球艺精湛，一生获得无数荣誉，当时民间甚至流传着“听戏要听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佳话。李惠堂不仅球艺精湛，更有着一颗爱国之心。抗战时期为了响应宋庆龄救济水灾难民、慰问抗日将士的号召，他组织起足球队，先后组织举行足球义赛和宣传活动138场，以自己的方式筹集善款赈济灾民，支持抗日救国。

李惠堂的义举让宋庆龄非常欣赏。1946年夏，中国福利基金会发起募集中国灾荒救济基金，宋庆龄亲自邀请李惠堂带队来沪举行足球义赛，筹集善款。李惠堂欣然应邀，出面召集香港足球名将组成球队抵达上海，上海各大报均刊载了这一消息。

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国际饭店二楼孔雀厅举行盛大茶会，招待本市体育界、新闻界，并介绍香港华南足球队全体球员与大家见面。李惠堂发表致辞：“此次承孙夫人之邀，来沪举行义赛，得与旧雨新知，晤聚一堂，易胜欣幸。抵沪后，始知此间对义赛小有误会，冤望能捐除成见，共襄善举。”

李惠堂所说的“小误会”是指什么呢？

原来，听说宋庆龄打算发起足球义赛，国民党政府认为所谓义赛就是对解放区的支援，便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他们暗地里通知上海的各支队伍不得接受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邀请，还以私人的名义向远在香港的李惠堂打招呼“暂时不要到上海来”。不料，李惠堂不予理睬，率队到了上海。于是，市体协就给李惠堂率领的华南足球队发函，指出球赛季节已过，比赛“不相宜”，而且球赛应由体协主办，球票更需事先核准，“体育法统不允许破坏”等等。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稽察处长还亲自出马，威胁上海足球界人士，责令东华足球队不准参加孙

夫人举办的义赛，声称：“这是南京总统府的电话命令，指责孙夫人办足球义赛有政治色彩。如她定要举办，将动用武力干涉。”

虽然遭遇重重阻挠，然而灾情严重，救济刻不容缓，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仍以极大的诚意和耐心再次提出申请，说明此次义赛是救济苏北湘中灾区活动的一部分。为了办好足球义赛，基金会做了很多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耐心动员上海的各支足球队，得到各队的支持。

华南队更是认真备赛，全体队员由李惠堂率领，每天到逸园的运动场练习。东华、西侨、犹太的名将，均到场观摩。只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操纵的青白足球队的少数人公开扬言：“一切当以体协意志为意志，不与香港华南足球队进行义赛。”

宋庆龄知道当局故意刁难，为了表示诚意，亲自宴请市长吴国祯和市体协常务理事何德奎、沈士华等，席间，宋庆龄再次说明此次举办义赛的意义和经过，希望在座者协助，吴国祯等当面均表赞同。

在广大市民与舆论界的压力下，市体协常务理事与足球委员会不得不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华南队来沪后的对策，并放出话来，如主办方再作申请，还可讨论此事。当晚宋庆龄再次会见市体协会长及各理事，商讨此事直至深夜。

此后，中国福利基金会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以公函再向市体协申请许可，做到仁至义尽。市体协也召开临时理事会议商讨此事。最后会议决定，接受宋庆龄等人提出的举办赈灾足球义赛的提案，但“交足球委员会积极筹备”。足球委员会随后召集临时会议，决定举办三场比赛，公布于上海各报。

然而，人们并不知道，此次赛事的发起人宋庆龄本人并未同意这个方案，体协的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让宋庆龄非常愤怒，同时，由中国福利基金会发起组织的这场义赛最后被当局“绑架”也是宋庆龄无法接受的。

为此，当局又四处奔走，派人致函华南队，以业余球员要服从市体协安排为由，企图强令该队参赛，不料华南队复函市体协：“……昨经敝队开会讨论，均以此次来沪，纯系福利会孙夫人之邀，在理应请贵会向孙夫人处先行洽商。”

此时距离第一场比赛已不到一天，而且第一场比赛的门票均已售出，若是几万群众闹起来，当局更下不了台。副市长吴绍澎只得亲自上阵，与李惠堂和华南队谈判，最后仍无结果。当晚，李惠堂向记者发表谈话：“本队此次应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孙夫人之邀，来沪参加义赛，赈济湘苏灾黎。本人率队来沪，乃团体行动。非私人行动也。一切悉听诸福利会。”

当局无奈只好宣布比赛暂时取消，并致函宋庆龄，妄图挽回：“……素仰夫人脍炙与为怀，球赛义举，谅荷赞同，惠及灾黎，无任德感，专此布达，并盼惠示是荷！”

然而宋庆龄并未予以理睬，而是向李惠堂和华南队的球员们表示歉意，但是，在比赛的问题上，宋庆龄的态度仍然十分坚决，她说：“你们是我请来的，（他们）不让我给（组织）你们比赛，那末送你们回去，是我的责任。”

就在李惠堂率领华南队搭乘邮船准备离沪之时，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又突然邀请李惠堂会面，称自己尝试作“最后斡旋”，建议以“为本市警察福利会筹募经费”的名义进行义赛，但华南队坚持要“征得孙夫人同意”，宣铁吾知道无望，只好说“因公务忙碌无暇与孙夫人晤谈”。

最终李惠堂带着球队返回了香港，而中国福利基金会则蒙受了巨大损失，因为此次不仅不能靠足球队筹款，还得支付请球队来上海的巨额费用。

尽管如此，李惠堂对救济福利事业的热情还是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年，宋庆龄再次与李惠堂商议，由香港足球协会出面

举行义赛，为中国灾荒救济基金募捐。这次，宋庆龄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一方面向上海体育联合会申请许可证，另一方面还提醒对方办理“任何需办的政府方面的许可证”。

此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与李惠堂以及香港足协之间的合作成为一种惯例。1948年2月，宋庆龄致信香港足协秘书，对去年收到的捐款表示感谢，而今年，“这种帮助更加需要”。1949年，宋庆龄又直接致信李惠堂，谓：“去年你与陈汉明先生为上海儿童工作取得基金给予帮助，万分感谢。……今年如能大力帮助使敝会得香港足协基金的再次分配，我们将不胜感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宋庆龄与李惠堂联系渐少，尽管如此，20世纪40年代李惠堂与宋庆龄的这段精诚合作还是在中国救济福利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



1948年，宋庆龄在检查中国福利基金会准备运往解放区的物资。

宋庆龄去世后一年，1982年5月29日，在北京成立了宋庆龄基金会，邓小平同志亲自担任基金会名誉主席。从那时起，宋庆龄基金会就一直积极支持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先后在新疆、延边等地开设了宋庆龄足球学校，培养出了不少优秀足球运动员，活跃在中超、中甲和中乙的赛场上。2011年，宋庆龄基金会又专门设立了青少年足球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支持新疆和延边宋庆龄足球学校的发展、举办全国性青少年足球比赛、开展两岸及港澳青少年足球赛等，此外，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还与中国足协共同举办两岸暨港澳青少年联赛、全国U15青少年足球联赛总决赛等。如今，宋庆龄与足球的故事正被她的后继者们用另一种方式续写着。



1964年5月，宋庆龄观看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小足球队》后，与演员们合影。

参考文献

- [1]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
- [2] 宋庆龄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97年。
- [3] 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
- [4] 宋庆龄往来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 [5] 宋庆龄书信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
- [6] 挚友情深——宋庆龄与爱泼斯坦、邱茉莉往来书信，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
- [7] 宋庆龄致陈志昆夫妇陈燕书信选编，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1年。
- [8] 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
- [9] 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 [10] 宋庆龄年谱长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 [11]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
- [12] 宋庆龄的后半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 [13] 宋庆龄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 [14] 回忆宋庆龄，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琼英留韵：宋庆龄生活故事/上海市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主编. —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427-6473-7

I. ①琼… II. ①上… III. ①宋庆龄 (1893—1981)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02686号

责任编辑 吕 岷 诸黎敏

琼英留韵

——宋庆龄生活故事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编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832号 邮政编码200070)

<http://www.pspsh.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00 字数 00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27-0000-0 定价：00.00元